

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

——兼论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流

易惠莉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近代之初, 中日文化交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继续前近代状况, 两国士人只是在传统文化情趣层次的交流上发生共鸣, 而缺乏向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方向发展的动因。尽管是存在着坚持各自国家利益的立场问题, 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士人的精神境界与日本士人的差距。1870 年代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中国士人王韬间的一段交往经历, 正足以说明这一结论。冈千仞在与王韬交往的最初阶段, 虽含有在近代方向发展的动因, 但是并未发展下去, 两人的关系仅局限在对于传统文化情趣的共鸣, 而且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冈千仞及日本其他汉学者在追逐正在日本逝去的美好事物——汉文化——的心境下与中国文人交往, 在中国文人那样的精神境界和中日两国那样的关系背景下, 他们的交往活动以及他们正在从事的汉文学事业, 就只能成为汉文化在日本逝去中的一曲哀婉的挽歌。

关键词: 汉学家; 冈千仞; 王韬; 中日知识界; 社会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近代之初, 中日文化交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继续前近代状况, 两国士人只是在传统文化情趣层次的交流上发生共鸣, 而缺乏向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方向发展的动因。尽管是存在着坚持各自国家利益的立场问题, 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士人的精神境界与日本士人的差距。1870 年代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中国士人王韬间的一段交往经历, 正足以说明这一结论。

冈千仞(1832—1914), “始名修, 字天爵, 通称启辅, 维新以后, 废通称, 乃改名千仞, 字振衣”。^[1]他“先米(美)使航度一年, 游江户入昌平黉, 前后在黉九年”, 其间曾出任昌平黉舍长。^[2]1854 年日本幕府与美国定通商条约, 冈千仞“在昌平黉, 与同窗诸友连署上书, 大意谓祖宗法度不可不遵, 列夷陆梁不可不惩。幕府世职征夷, 三百列藩八万麾下, 固备外夷之侵寇也。彼系军舰要开港, 迹既不恭, 事固无名, 以全国敌忾之公愤漏之一二, 军舰固未为无算也”。^[3]在儒学继承方面, 冈千仞以宗阳明学自居, 好论国际大势, 于政事以“用强”为立场, 其文章被日本汉学界称为“乃同甫之流者”, ^{[4](P202)}即以南宋陈亮相比。在儒学以外的知识领域, 冈千仞也早有涉猎和心得, 所谓“少时读新井氏《采览毕言》, 其作氏《坤輿图说》, 衫田氏《地学正宗》, 略知五洲之大势。及得《地理全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 愈审其大势, 慨然曰, 彼所以致富强者, 由泛通有无贸易耳, 而未得其说, 及巴氏问答笔记出, 始得其详”。^[5]冈千仞与同时期的中国士人王韬, 除了个人经历有颇多相似外, 还有建立在深层文化意义上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 导致在 1870 年代间冈千仞与王韬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文事交往, 在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中居特殊地位。本文以二氏文事交往为线索, 探讨中日文化交流基于同一儒学文化背景而特有的丰富而又错综复杂性的一面。

1 1860 年代的上海与中日文化交流

虽然有长崎贸易的存在, 但江户时代中国方面从中日间文化交流中所得甚少。江户时代仅有日人所著诗文、经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作品传入中国的少数事例, 如新井白石的诗集,

获生北溪校订的《唐律疏议》、山井鼎（1690—1728）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其中前两种分别求得清政府高层官员的序文，第三种则在中国多次翻刻，这在日本成为汉学界引以高兴或自豪的事。¹ 镰仓幕府时代编年体史书的《吾妻镜》也曾在康熙年间传入中国，但在锁国时期日本史地方面书籍的出境则是受到严厉管制。²

1860 年前后，在上海的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如阿礼国、裨治文、玛高温等研究日本的文字和历史，³ 从而有了近代日本书籍传入上海的记录。1861 年初南方士人赵烈文在沪，“见兰卿（王韬）处东洋书甚伙，有《日本外史》廿余卷为最巨帙，国人赖襄所着，赖，国之文学布衣也”。^{[6](P166)} 该日赵氏读日本书籍生发出如下感想：

“元世祖威遍华夏，兴十万之师而不能得之于日本，虽若有天助，然亦其国修明，足以御侮，非尽侥幸也。迺来泰西与之通商，炮火之精，舟楫之利，以蕞尔小国，夷然处之而不惊。嗟乎！安在地广人众始为强哉？”^{[7](P75)}

赵烈文身为藏书家，从他的反应来看，这些书系当时江南罕见之物。⁴ 1862 年幕府官船“千岁丸”访沪后，日本书籍输入中国才略见增多。⁵ 1864 年幕府官船“健顺丸”访沪，上海道应宝时在接待中曾向幕吏山口举直索岩垣松苗著《国史略》，同行中无此书，山口以赖山阳著《日本外史》相赠。⁶ 此后又有日本汉学家主动赠书的例子。如 1866 年，日本最有地位的汉学家安井息轩托率留学生赴英国而途经上海的中村正直将所著《管子纂诂》带往中国。⁷ 中村记此事，“仲平手授是书曰：子赴英国，必道由苏松，苏松者，学士文人之渊藪也。请携此书，赠之彼国人，或者余著书得传于彼邦，亦生平一幸也”。^[8] 安井赠书引发了近代以来中日上层士人间第一次值得重视的文事交往事件。

中村一行 1866 年 12 月上旬抵沪，将《管子纂诂》赠于上海道应宝时。次年春该书转入俞樾处，并继续在当年传阅于江宁刻书局戴望、张文虎等名学者间。⁸ 《管子纂诂》此番传播的缘由见俞樾《与戴子高》函：

“……日本士人仆于上海亦见其一，然不足谈，盖非足下所见者。近得彼国人安井仲平《管子纂诂》，足下亦得之否。其书似不及物君之《论语征》，⁹ 然仆实未及细读，惟记其订正戒篇之里官为厘宫二字之误，颇自有见。又时引古本，仆未尝详校，未知与今本孰胜也。……”¹⁰

俞樾函中所谓“不足谈”的日本士人系受幕府派遣 1867 年春率员来华考察商务的名仓信敦。名仓曾于 1862 年随“千岁丸”使节团访沪，结识有如严伯雅、王庆勋等有地位的官绅及其家族，并是唯一进入李鸿章淮军大营观操练的“千岁丸”使节团成员。¹¹ 名仓“好兵学”，且性豪爽、善交际，名儒俞樾于他有“不足谈”的感想亦属正常。1867 年二度来沪的名仓从应宝时处获得“限三日即返”的南京之行允准，同时受托将署名应宝时的《〈管子纂诂〉序》一文携带归国转交安井氏。¹²

名仓 1867 年 5 月归国，时正值日本国内维新战乱，直到 1870 年安井息轩才收到应宝时序。为此安井作《书应宝时〈管子纂诂序〉后》，感慨当时日中文事交通辗转之难：

“明治庚午（1870）正月十八日，此序传自名仓氏。据落款，其国同治六年（1867）所撰，为我庆应丙寅，距今五年，隔海为国，犹幸其不致沉没腐败也。……余既以应君为知己，欲修书质所疑以厚交谊，而国有大禁，乃装为横幅，因记其所由，以答盛意。”¹³

日本江户幕府时代严厉的锁国体制，成为中国知识界获取有关日本的知识的主观障碍，幕末随着锁国体制逐渐解体，这一障碍逐渐消失，¹⁴ 中日文化交流从 1860 年代中期起已显示出近代性质，江南政界高层人士对日本的信息十分敏感。1865 年丁日昌引日本近事作为中国设厂造轮船之理由，并转达于曾国藩：

“顷闻英、法二国合攻日本，尽毁其港内炮船，业与议和。然日本胜，固足为我它日之忧；即日本败，亦非我目前之利。近年日本专心致志，购船造器，几及泰西之

精能，但不如泰西之娴熟，然犹不能以之制胜。则凡炮船之类，于日本并不如，日本者亦可皇然谋所以自强之术矣。”¹⁵

丁日昌对于日本近期发生的事情有准确的传达，反映了同治初年上海作为中国获取日本信息中心的情况。1869年、1870年之交，江苏士人方楷将自著世界地理著作“球图凡例一册”寄呈曾国藩，曾氏对此书“考定经纬度线及地名界域，均能精审，其不能确定者，则不强不知以为知，尤得阙疑之义”的著述态度甚为赞赏，首先具体评价图册关于日本部分的成果：

“大著图说数则，体裁既当，考订尤精，内如日本国，则以倭人自绘之图为定，

而据皇清通考、南怀仁坤舆图说等书，以定武备志及魏、胡诸图之误”。¹⁶

可见当时已有较为完善的日本地理图籍传入中国南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70年日本政府提出建交谈判要求时，南方政治家作出相对积极的应对，负责筹划谈判的李鸿章曾派盛宣怀赴日本“各处游历”“察看”。¹⁷尽管如此，总体上说直至明治初年，中日文化交流之局面并不乐观，中国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获益不但在数量上极有限，而且在质量上仍然主要局限在传统知识领域的狭隘范围，并以官方政治为主要的交流途径。¹⁸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对于中国有转折性变化意义的时间当在明治时代的1872年。这一年8月明治政府颁布学制，9月公布的小学教则规定了教学的内容、教科书、授课时数等细则。明治政府这项改革措施对日本传统的汉学教育造成巨大冲击，从而对日中文化交流间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日本书籍大量流入中国开始于1872年间。见1872年8月10日《申报》以《日本书籍》为题的新闻评述：

“日本文字同中国，而所刻中国书籍亦甚伙，字迹清楚，印法并佳，所用纸皆木棉所制，向来严禁出境，如中国儒士见者甚罕。今日本一切循行西法，书籍亦许出外贩售，故上海、广州书肆间皆有日本书，装潢颇有可观，价亦不甚昂，藏书家要不可不售一种焉。”

从知识内容的角度而言，贩售日本书籍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但数量上的增大则意味着交流渠道及领域的扩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具有近代意义的日中文化交流事件——中村正直在日本汉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拟泰西人上书》以《拟泰西人上日本国君书》为题在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发表。¹⁹明治初年日本汉学家具近代意义的时论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最早者当推此文。该文作于1871年底，1872年5月在日本先以英译刊于英文报刊，以汉文见报则是在1872年9月—10月间。上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中国教会新报》于1872年7月间以“日本人”为署名，分两期刊该文的汉文原本。^[9]

虽然中国与日本有同文之便利，但在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国传输方向上，西方传教士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位被西方传教士介绍于中国社会的日本近代学者是接受了西方宗教影响，汉、洋学兼备的中村正直，足可见中国近代的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起步发展的曲折。

2 王韬的《普法战纪》与日本汉学界

1870年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民间有所发展，其中王韬及其《普法战纪》当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王韬作《普法战纪》，“载笔于庚午（1870）八月，而断手于辛未（1871）六月”，^[10]在编撰期间已在香港华文报纸连载。不过《普法战纪》受到日本汉学界重视则是在1873年秋该书单行本刊行之后。1873年下半年日本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归国途经上海，使节团随员栗本贞次郎——汉学家栗本锄云之子——购得新刊书籍数部，其中即有《普法战纪》。栗本锄云初读《普法战纪》有如下感想：

“吾披阅尚未及半，窃以为该书不独记行阵之事、交战之迹，而其中议论能脱出汉人陈腐之常套，此乃珍贵之籍。于是有转辗贷借之人，吾因尚未得窥全豹。”²⁰

1879年，在《邮便报知新闻》“司笔墨”的吉田次郎也认为王韬“《普法战纪》前序》论欧

洲大势极详”，称赞王韬“论势文章洞五洲”。²¹王韬关于普法战后欧洲及世界局势演变趋势的分析由欧洲及于亚洲，最终落脚在东北亚事务，其观点对持“兴亚论”立场的日本汉学者和军部有吸引力，《普法战纪》乃在日本有1878年陆军文库翻刻本和1887年山田荣造校勘本两种。^{[11](P23)}《普法战纪》引起日本汉学界如此重视，除表面现象外，尚有值得深究的内容，因为当时日本就其国内翻译西文之能力及其对国际事务之反应的敏捷性而言，均远远超过中国。²²林乐知作于1880年的《环游地球略述》介绍日本翻译西书的情况：

“-----独是课读诸生古书尤为不足，故特延西士翻译天文、地理、格致、性理等书，或日人熟习西文者而自译之，编成书卷；并购在中国所译诸书，以备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日人翻译尤长者有二人，一富古稍华，一拿甲摩腊，所译西国政事风俗等书，自名公巨卿以及士庶，诵读之下，靡不钦佩。”^{[12](P7187)}

林乐知正视日本本国人在传播西学中的独立地位，所及尚仅限于民间著名者，前者为福泽谕吉，后者为中村正直。二氏西学（包括翻译）名著《文明论概略》、《西国立志编》分别出版于1875年和1870年。林乐知此说同时表明日本自中国输入的西学译着，只是满足精通汉文者特殊的需求而已。冈千仞于1884年在中国向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的以下陈述，也进一步说明了此点：

“尔时欧学未开，仆辈略涉域外事情，实由先生译书。敝邦欧学日开，译书续出，惟其人不文，故旨义不明。惟先生诸着，译义稳妥，行文明畅，可以知门下富能文之士也。”²³

1870年代日本汉学界并不是在了解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的功用意义上，而是在传统文化情趣的意义上对《普法战纪》发生兴趣。1879年王韬应邀访日，《邮便报知新闻》载《读重刊〈普法战纪〉》一文，即是从传统史学形式编译当代西方政治军事历史的角度对《普法战纪》极尽赞赏之辞，所谓：

“万国交通，四海为邻，当是时固不可不知其事而悉其情也。若庚午普法战争，欧洲全局形势之所关，而变局于是乎始。观世变者，尤宜深察其由焉。然而世之译西国文字者，大率无远识，且言之无文，故其辞不达，而事遂湮晦，读者无由窥其颠末，洵可憾也。尝读盲腐之史，至于城濮、邲鞍、钜鹿、垓下诸战，生气勃勃，精神飞动，盖其文章之妙使然也。清王韬宏才能文，且身历涉英法诸国，地形人情，了如指掌。故着此书也，强弱之势，胜败之数，及军伍布置，糗粮运输，一读如足踏其境，目睹其状。叙事之妙，殆乎逼盲史。而其战法则各国所俱用，以视周汉年代悠远，弓车久废，无取于今者，相去远矣。由是观之，盲腐之史可不读，而斯书不可废也。刻以行于世，亦可谓深知世变者矣。”²⁴

对于以著述为己任的汉学家而言，《普法战纪》的意义还不仅限于在传统文化情趣的层面。明治初年在洋学的冲击下，汉学倍受压抑。在传播西学——有关西方的现实和历史知识的时务活动中，如何才能有所作为，与洋学者竞争，这是日本汉学家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为保住汉学在日本史学领域一统天下的地位必需应对的挑战。²⁵王韬的《普法战纪》以传统史学体例——纪事本末体——成功地编撰西方当代政治军事历史，无疑对当时的日本汉学家是一个鼓舞，有着示范意义。

事实上日本汉学界在这方面也已有所作为。就在《普法战纪》传入日本的1873年年底，一部署名“冈千仞与河野通之同译”的汉文本《美利坚志》编撰完成。书中冈千仞以“例言”对该书的编撰作有如下说明：

“中学闭校，余与河野通之就闲，²⁶通之善读洋书，取米国史立课翻译。每一译出，付余润色。余以苦无事，反复涂抹，得其首肯而后已。通之曰，余不可私其功，因题曰合译。

“原书米人格坚扶氏所撰，通之以其过略，参观《瀛寰志略》、《联邦志略》、²⁷

《万国公法》、《格物入门》等书，间有可取，并载以补之。看者莫以其出入原书为杜撰。

“译述洋籍，务照原书，则其文郁嗇晦涩，或至不可解。是书先得其大意，而后下笔。原书前叙者，或举之后；译叙者特提其略，专要使读者易了其全局，译述之体固宜如此。”

“例言”最后一则强调该书体例的言辞，尤显冈千仞对于其作为汉学者的历史使命感：

“近时洋学者，专事译述，刊行书不知数，而一书分前后数篇，零丁破碎，谩无体裁。是书虽仅仅四卷，自米国草昧至一千八百六十年，治乱大略，历历无遗，此所以与近时译书异其撰也。”²⁸

冈千仞评本国洋学者译书“零丁破碎，谩无体裁”，而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译书赞赏有加，其思想背景是卫护固有的文化传统。日本汉学家与中国士人在这方面有共同的立场。冈千仞以汉文编撰西方政治和历史著作，工作模式及撰着体例与《普法战纪》不约而同，²⁹他迫切地期待自己的工作获得中国学者首肯，甚至日本出兵台湾，两国处于战争危机的时刻也未曾干扰这种迫切心情。冈千仞于1874年，“是书刻成，会小牧伟卿随钦差大久保大臣赴支那北京，因寄一部于驻扎公使柳原君请诸名流评阅”。后经丁韪良为介，任教于京师同文馆的李善兰在当年冬为该书作序。1875年春李序传回日本，冈千仞深以为荣，谓：“区区陋着犹辱支那名流鉴赏，不特陋着之荣，抑亦东洋艺文日盛之兆”。³⁰冈千仞由此成为明治时代最早主动与中国知识界进行具有近代意义学术交流的日本汉学家之一。³¹

1873年冈千仞和河野通之尚有意“将以次及英、佛（法）诸国史”。然《美利坚志》书成，河野氏即赴外县谋职，冈氏当时有“不能及各国，实为一大憾事”之感。³²他的第二部同类作品完成于数年后的1877年，即署名“高桥二郎译述、冈千仞删定”的《法兰西志》。1878年中国驻日本副使张斯桂、随员沈文荧分别为该书作序，次年5月汉学者竹添进鸿受命为琉球事件来华，他经由津海关道郑藻如递呈李鸿章的礼品中就有“《法兰西志》一部”。^[13]

3 日本儒者的“强弱论”的近代转移

日本当代著名学者丸山真男关于儒学在日本社会的本土化问题有如下论说：

“儒学思想，深深地浸透着产生它的特殊的社会条件，在它被普遍化并适应于异国风土、适应于异国的社会历史结构的时候，它就会明显地走向抽象化，在极端的情况下，至少就存在着语言上的共同性。”³⁴

明治初年围绕《拟泰西人上书》安井息轩对中村正直的批判，就与同时期中国反对西方宗教的言论有颇多的相似之处。幕末面临西方要求开港的战争威胁，日本士人在探讨应对危机的对策时采用了与当时中国士人完全相同的话语模式——“强弱论”。虽然具体主张有“用弱”——“开港”和“用强”——“攘夷”的分野，但是对于“用强”无论是作为应对挑战的当然立场还是作为长期国策，却并无分歧。时为幕府儒员的中村正直在《唐太宗伐朝鲜论》中就写道：

“汉武帝用兵匈奴，唐太宗之伐朝鲜，人皆咎其穷兵黩武，覆军杀将，竭中国之财，以拓无用之地。抑不知使此二君辄溺宴安，偃兵革，遽与民休息，其为一时之计则得矣，然后世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吾尝论之，国之有武犹虎豹之有爪牙，所恃以自保也。故无此武，则无此国矣。-----汉唐之所以强盛者，未尝不由于武帝、太宗用兵之效也。我丰太阁之征朝鲜，论者亦以黩武讥之，然我邦之武威，赫然布于四远，使狡焉欲肆其封疆者，至今顾望不敢动者，庸非太阁一征之余烈乎。盖亦武帝、太宗之类也。”³³

中村的“用强”主张，与同期中国王韬的《反〈用强说〉》基本相同。^[15]它在本质上也与魏

源编撰《圣武记》相似，都是因外力威胁而激发起对于本国历史上开疆拓土事业的肯定。儒学包括朱子学的官方文化并未构成两国在应对外力挑战时“用强”的主张和行动的束缚，相反它具有正面的激励作用。如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政坛和社会舆论中，“卫护名教”名义下的“用强”主张从来就占上风。中日两国在继承和应用儒学价值观及传统思想方法以应对西方挑战方面的差异，言论层面的反映远没有实践层面那样强烈。这与近代前两国社会政治文化和精神方面留下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

江户时代的日本，幕府对外实行锁国闭关，对内则推崇朱子之学，为其统治提供政治文化基础。尽管中国明、清两代朱子之学也被尊为官方文化，然两国现实政制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令作为官方文化贯彻的朱子之学在各自国家产生的社会效果完全不同。丸山真男评价江户时代儒学地位：“即便是十分消极地看待儒学对日本影响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儒学适应日本社会的时代，这就是儒学最为兴盛的德川时代”。“日本近世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儒学伦理的思维结构在类型上相似，这就是近世儒学作为最强力的社会伦理在思想界中能够占据指导地位的客观条件”。^[14]江户时代日本，封建政制下的上下秩序的严格贯彻和“武士道”精神的存在，导致朱子之学内在的社会道德教化意向具有得以实现的客观社会基础，³⁴儒学社会政治伦理的核心观念——“忠”的社会实践，从而被延伸到职业上的“奉献”和“义务”，由此衍生出个人对于社会的“职分”意识，令不同阶层的人“在作为‘伦理行动主义者’-----方面，它们与武士道是一致的”。³⁵因此，儒学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学问，而且作为信仰而流行于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信仰区别于学问，在于它以行为作为重要环节，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中、日两国的社会在具体贯彻儒学关于个人对于社会、包括对于国家关系的伦理规范方面的差异，最终就表现在将其作为学问还是信仰，作为言论的对象还是行为的规范。费正清、赖肖尔关于在西方的近代挑战之前中、日两国社会政治条件的差距有下述结论：

“日本已经具备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它的人民已做好准备，从而为民族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但中国却不具备这种基本要素。-----日本的封建制度已经造就了各藩忠诚的行政官员、商业资本家、研究荷兰的学者以及具有爱国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的武士等，这些人足以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从而与其它民族国家竞争”。^{[16](P399)}

总之，江户时代日本的士人对于忠诚勇武精神之崇尚没有流于空言，无论是朱子学派或是阳明学派，甚或是国学派，儒学关于个人对于社会上下关系中的伦理规范——个人的社会“职分”对于士者具有切实的约束力。³⁶江户时代的社会政治和学术遗产在明治时代初期就有明显的效果。赖肖尔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普及西方知识方面起过主要作用的福泽谕吉，强调个人自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西方成功的奥秘，而当时很有影响的两部翻译著作是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³⁷日本知识界对西方学术能有如此反应，当与日本社会既有的条件及其需求有关，它代表了对个人从传统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时代需要，更具体说明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日本有适应向近代观念意识转移的社会基础。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提及两部西方近代名著的译者均为中村正直。³⁸中村在明治前后学术的及生活的经历，恰足作为说明中、日两国传统的儒学者在应对西方近代挑战之际表现差异的典型例子，这对于本文讨论的主要人物冈千仞和王韬都具有价值的对比意义。

中村正直（1832——1891），号敬宇，年甫二岁即受读四书，在接受汉学训练的同时，1846年从幕府侍医桂川甫周习兰学。中村以其儒学根基，1855年出任昌平黉教授，1862年任幕府儒员，1863年为将军侍讲，1866年被委以留学英国学生监督的重任。³⁹中村于1868年在明治维新幕府覆亡的背景下归国，并追随去位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静岡任学问所教授，直至1872年奉明治政府大藏省命回东京译书。中村于1873年在东京创立“同人社”，从此以私人教授、译书为业。⁴⁰从个人性情而言，中村自幼体弱，居家“叱咤靡闻，鞭笞奚

及”，入学同学间则有“吐露肝胆，亲似弟兄，讲究浑噩，互务提醒”的感受。⁴¹中村早年学业仕途一帆风顺显而易见，生活经验和学术素养造就其淳淳儒者之形象，而且经维新造成的个人身世浮沉而毫无改变，王韬于1879年访日时便感到他“温厚笃挚，教诱后进，蔼然可亲”。1880年代两度出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评价他“为人纯白简易，立身有本末，无随俗俯仰之态”。1880年代后期两度游历日本的傅云龙则以“学问中君子人者”誉中村。⁴²

值得重视的是明治后中村接受西方学术，包括宗教思想影响，以及他对日本外交问题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儒家“中庸”的人生哲学。⁴³对此黎庶昌有颇为中肯的评价，认为中村在明治时期的著作，“措注时事，持议欲酌东西之中而剂其平，其文若江湖之水波澜滢漾而无泛滥也”；“不泥古不薄今，舍己短取人长，深合汉儒实事求是之旨，岂非君子之用心而能若是乎？”⁴⁴东西方思想的融会令中村传统的“强弱论”观点发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转移，一方面他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由对外关系的“用强”论者转变为非战论者，⁴⁵对“彼或以力，则我唯有婉曲以免难”的弱国处世之道予以同情的理解和赞赏，明确反对日本社会的亚洲扩张思想；^[17]另一方面他吸收了西方文化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成分，孜孜不倦地宣传个人自强自立等近代的人生观。中村是在个人道德完善的意义上强调个人自强自立的价值，增强民众提高自身智德的自觉，认为“国之强弱，在于人民智德之多少，而不在版图之大小”，由此表达了明治时代汉学家中十分独特的和平主义立场。将关注的重点由国家移向个人，并且是作为民众的个人，这是明治时代“欲酌东西之中而剂其平”的中村实现近代观念转移的思想特色。这种对于个人的关注无疑与日本社会从来就注重个人对于社会关系问题的传统有关。在日本，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观念意识的近代转移并非以对传统的抛弃为代价，而社会固有的以儒学伦理观为基础的“职分”意识在近代环境下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中村的行为最有这方面的说明意义。1872年中村在个人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作《拟泰西人上书》，公开主张废除江户时代以来的禁止西方宗教的政策，⁴⁶1878年他在国内、尤其汉学界普遍支持政府琉球政策的情况下十分坦白地表明不以为然的立场。中村的行为表明，在日本儒者传统的“用强”主张中包含有鲜明的道德意识，即处世处事于“公”的“忠”，于“私”的“诚信”，具体则体现为对人、尤其是对个人坚持正当、正确行为的道德自觉。从《拟泰西人上书》公开宣称对西方宗教的认同，到公开宣称非战论立场，中村一贯特立独行，然又毫无哗众取宠之心，支持其行为的正是高度的道德自觉。如他晚年自述：“余尝作《拟泰西人上书》文，世之儒者或以余为助异端者，哗而攻之。然其实敬仰孔子，始终不变，且深愿孔子之道，行于上等社会，为治平大本也”。⁴⁷

中村将坚守个人认为正当、正确的行为视作实现自强自立的道德实践。正是如此，当他在论及作为“征韩论”和大陆扩张论的代表人物，并不惜以叛乱达到地方士族与明治政府间矛盾解决的西乡隆盛时，仍能深情地作出下述评价：

“抑余有说焉，君者天生异人，盖世豪杰，其成不足为君之荣，其败不足为君之辱，均足以益加君之大也已，于君何憾哉。独其从君而死者，实为可悯焉。虽然，事成则与君共荣，固也；不成而死，亦与君共不朽。”⁴⁸

中村关于败亡后身被叛乱恶名的西乡的评价，其意义不是简单的不以成败论英雄所能概括，它说明中村对于战争的道德评判与对战争行为者在贯彻“用强”立场时所体现的个人道义及道德精神评价的区别对待的思想方法，⁴⁹而且表明即使在明治时期中村已成为非战论者，但是深刻的“志士”情怀令他并不一概否定极端的激烈行动在解决现实政治争端问题中的作用和价值。⁵⁰

总之，从中村在明治时期的言论活动可以看到传统的“用强”论与儒家的道德理想相结合实现近代创造性转移的线索——由传统的单纯出于对国家强弱盛衰的关注向对个人（从士人到民众）自强自立的人格尊严的关注。而在同期，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始终不出传统的“用强”论范围，对于个人的关注则始终局限在传统的道德意义，没有出现关

注个人自强自立的任何迹象。⁵¹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界始终没有出现如中村《僻村牧师歌》、《打铁匠歌》这样的士人诗作并非偶然。⁵²失意的士人时而汲汲于仕途,时而愤世嫉俗,终于铤而走险,走上传统的造反道路者有之,但在近代自强自立的意义上诉求于自身而成为思想者、创业者,则几无一人。

持有如此对华态度和维护传统道德立场的中村,本可以成为在明治时代日中文化交流中发生大的影响作用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历届驻日使团的有名士人,尽管对他不乏好感,并且交往密切,但除了黎庶昌曾对他有前述的评价外,均未留下任何关于中村有关近代意义文字感想。⁵³向中国推介中村的是在华西方传教士。1872年《中国教会新报》以“日本人”署名刊载《拟泰西人上日本国君书》后,1877年2月该文再次以《拟泰西人上书》为题刊于《万国公报》,未署作者姓名。⁵⁴翌年林乐知在返美归途中游历日本,对日本人在介绍西学方面的成绩有深刻印象,除所著《环游地球略述》以很多篇幅介绍日本政治文化历史外,⁵⁵还在1880年《万国公报》上大量刊登日本人的汉文西学作品,其中即有署名“日本人中村敬字”的《僻村牧师歌》,署名“日本永东洲”的《立志说》(该文是关于中村译《西国立志编》中第八编主题的衍义)以及中村的学生、日本驻华公使馆外交官中岛雄的作品。^[18]因此中村是明治时代前期经由传教士向中国推介最力的日本学者。另外值得提及,在中日琉球争端的背景下,1879年10月1日《申报》刊出中村的《〈冲绳志〉前序》。⁵⁶这为中国知识界了解中村对华特殊的友善态度提供了可能。从王韬的《扶桑游记》关于中村的记载,可以感受到中村对于中国口岸知识界来说并不陌生,而且不乏好感。1884年冈千仞访华,与上海龙门书院等士子笔谈,被问及的日本汉学家只有中村一人。⁵⁷除驻日使团人员外,在个人交流方面,⁵⁸中村因井上陈政的关系,于1880年代与俞樾有过相互赠诗、赠书;⁵⁹在此之前,1870年代中村与在北京的江苏士人谢隐庄亦有文事交往,谢氏与北京中西方高层人士均有关系,因此双方联系的建立推测当由西方人介绍。⁶⁰美国人丁韪良编《中西闻见录》1875年8月号刊载谢隐庄《格言四则》,其中《爱敬为学术治道纲要》一篇,隐约透露他曾读过中村正直在明治初年的相关文字。⁶¹1878年后中村的学生中岛雄作为外交人员长期驻留北京,与中国文人有广泛交往。尽管有如此多的交流渠道,但是仍缺乏中村译介《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时以汉文写就的多篇序文传入中国的明确记录。直至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接受日本英雄史观的影响,在崇拜吉田松荫等维新志士的同时,对中村译介的西方著作发生了极大兴趣。在1899年9月《清议报》二十八号《饮冰室自由书》栏中,梁启超先于《理想与气力》的标题下表明其英雄史观的立场:“理想与气力兼备者英雄也”,然后对中国政治现状表示痛惜:“我中国四万万人民,有理想者几何人,有气力者几何人,理想、气力兼备者几何人?嗟乎,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念及此可为寒心”。以此为引子,梁氏极为郑重地向国人推荐中村及其译介《西国立志编》,谓:

“日本中村正直者维新之大儒也,尝译英国斯迈尔氏所著书,名曰《西国立志编》,又名之为《自助论》。其振起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之下矣。今将其原序录出,虽尝鼎一臠,犹足令读者起舞矣。”

梁启超在第二十八号全文载中村《西国立志编总序》后,第二十九号又续载第一、四、五、八、九、十一编所作的汉文序。⁶²孙宝瑄从《清议报》上读到中村文,1901年3月日记抄录《西国立志编总序》首段自“凡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先有自主之志行也”起近二百字,以“余以为至论”的评价为结语。在紧接引文之后,他以“余分治民之法有二:曰内导,曰外导;内导,教也,外导,政也”,阐述自己的读后感。⁶³身为贵公子的孙宝瑄显然不能与中村文章在鼓舞个人自强自立的意义上发生共鸣,他也许更适于接受与传统政治学有沟通余地的李提摩太所宣传的“教民养民”说。

1903年转译自中村日译本的中文本《自助论》由上海通社刊印,书中收录中村为日译本所作全部的汉文序。该书在次年春两次加印,书后附页推荐该书的文字亟称:“今者明哲

之士多以道德腐败、青年堕落为中国忧，此种书盖不可不亟读焉。”⁶⁴ 总之，自梁启超到孙宝瑄，再到上海通社，中国新锐的知识界对于《自助论》以及中村文章的理解都是立足于国家政治的意义，而非立足于个人道德精神的意义，这与这些作品本有的意义是有距离的。

4 社会进化论——从《美利坚志》到《法兰西志》

中村正直的气质及其早期生活经验造就其淳淳儒者之性情，令他在接受西学后思想观念的演变以及特立独行的生活和学术道路的选择贯穿了明显的理性精神。¹至于在冈千仞身上发生的一切则完全是另一番气象。原因不仅在于二氏儒学所宗以及幕末政治斗争中立场的差异，²而且还有个人性情以及早期生活经验方面的差异。关于冈千仞的个性气质，黎庶昌论其文风中有鲜明的描述：

“天爵志在用世，百不遂一，其怀抱郁勃之气充然不可诘止。其文若深谷高岩，时露巉岬。余读其文，悲其志，未尝不惜其穷老不遇，而无大力者为之援也。”⁶⁷ 南方文人姚文栋对冈千仞的感想则表达的更为直露：

“维新而后，移家东京，而不得志于当世，倩沈梅史书‘穷愁著书’四大字，欲借文字以抒其无聊不平，必将有大著作出焉。”^[19]

冈千仞愤世不平的心情是由个性气质和生活经历相互激励造就，由来已久。幕末仙台藩政主张“佐幕开港”，使倡导“尊王攘夷”的冈千仞在本藩难有仕途上的发展机遇。离开昌平黉，冈千仞一度来往于江户、大阪，交游“尊王攘夷”的志士浪人，无所成而归藩，“闭门息影，教授徒弟”为业。生活磨砺令冈千仞有命运不济感想，同时也激励他在“用强”方向发展。下述事情即足可见其个性中的“用强”。1862年后藩内一度举荐冈千仞出任藩校“养贤堂”教职，他因与藩校“学头”大槻盘溪的学术主张不同而拒绝，⁶⁸慨然致书曰：

“夫藩黉总于督学，督学所以为是，在学职者不得不为是。督学所以为非，在学职者不得不为非。督学尊信程朱，藩黉所课论孟学庸，所讲性命道德。某于经书，诵读大义，问本旨如何而已，常谓性命道德之说，宋儒之一家言，非学者之所宜急。今口性命道德者，概同甫所谓风痹不知痛痒者。某为学大本，与督学异其旨如此。”⁶⁹

作为一名“攘夷”主张者，冈千仞之“用强”当然并非限于小事，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他的表现也不同凡俗。1868年明治政权建立，以仙台藩为首的东北诸藩成立反明治政权的奥羽越列藩同盟，冈千仞力图以“尊皇”大义说服本藩归顺明治政权不果而下狱，后奥羽越列藩同盟失败，仙台藩处于“维持宗社覆亡时”的危急关头，冈千仞则上书明治政府，建议奥羽诸藩迁徙北海道从事开发，以免废藩惩处。⁷⁰在危急关头，他充分表现出勇敢赴义的忠勇品格。在明治初期的藩阀政治环境下，“佐幕”强藩出身的冈千仞虽仍“不得志于当世”而愤愤不平，⁷¹然其坚守“为学大要，以立志为本”的心志，以及“不能随俗俯仰”的处世态度始终不渝。正是这样的心态促成冈千仞在1870年代“能究心于域外大势”，而有《美利坚志》、《法兰西志》等著述成果。⁷²

区别于中村正直，冈千仞基本上是在传统“经世致用”的意义上，以研学西方历史为途径接受西方近代学术影响——贯穿于19世纪中期西方史学著作中的社会进化论，其所恪守的“用强”论与社会进化论发生了不期而遇的共鸣。传统“用强”论与西方社会进化论发生共鸣，不仅冈千仞如此，也普遍存在于明治初期日本知识界。明治初期日本士人除尚武精神与中国士人大相异趣，在历史观念上亦多有与西方进化论相通的方面。如日本儒者川田瓮江作《〈美利坚志〉序》谓：“华我夷彼，固非天下之公道；而取于人以为善，往圣之所嘉；今之视昔，足以见文化日新之效矣”，在非议“华夷之辨”的同时，初步显示出对文明进步历

史观念的接受。⁷³中日两国士人对美国历史兴趣方面的重大差异即由此而来。从1850年代蒋敦复作《海外异人——华盛顿传》到1874年李善兰作《〈美利坚志〉序》，其兴趣都重在华盛顿制定民主政治制度，总统“定例四年一易，传贤不传子”，不但力图以美国的政制来映照中国的传统政治理想“三代遗意”，而且自然地流露出对圣贤政治——“人治”的期盼。而日本士人对于美国历史的兴趣则显然另有所在。藤野海南作《〈美利坚志〉跋》所关注的是美国民主政制之历史来由，⁷⁴所谓：

“盖当英王欲一教旨，其与王异见者，千百成群来开新地，以殖人种，以文明已开之民，据淳朴未散之地，一意事天，无君无臣，协同和合，连社申约，以护人人自主自立之权。方此时虽不备共和政治之名，共和政事之实固已兆焉。华盛顿即据其实而立其名，非故设名从而实其事也。”

藤野从殖民历史认识美国民主政制发生之原因，意在表达“如此之俗尚，原于米（美）国自然之习，岂他国所能仿乎”的立场。自然这中间并没有历史观念更新之迹象，日本士人关注西方殖民历史的兴趣来自其它的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

对近代国际环境的正视，导致日本政府和社会及时地在近代意义上健全国家观念，由此国权意识日兴，从幕末就开始的殖民开发北海道以保卫北方疆域的政府举措，在明治时代更大规模地进行。奥羽越列藩同盟事败后仙台藩举藩迁北海道从事开拓，冈千仞因此在认同西方殖民历史的问题上非但无任何障碍，而且还有特殊的兴趣。冈千仞在《美利坚志》结尾处总结全书的史论，虽然以赞华盛顿“盛德大业，駢称之唐虞”为重心，有与中国士人相同的意趣，不过他正面而深刻地涉入了西方殖民开拓美洲之问题，其中蕴含着他对社会进化史观最初的感悟。所谓：

“华盛顿府议政堂宏丽冠天下，傍有一铜像，面肤垢秽，被服褴褛，殆如异类，导者指示曰，是为土蕃人像，华盛顿创建以前本国衣服风俗，概皆如此。顿建此像，其意以为本国陋俗如此，而后世知见日开，文明日进，有殊才异能之士，果能出其间，则虽以土蕃与我异其类，尚能擢任统领之尊，无所少系吝也。”⁷⁵

总的来说，冈千仞在撰着《美利坚志》时，传统儒学观念并没有遭遇正面的挑战，一则“华夷之辨”便于日本士人认同西方的美洲殖民为文明的扩张，因此无论是藤野还是冈千仞笔下都完全缺乏辨析殖民扩张行为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意向；⁷⁶二则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及其结局也都完全能够统一于儒学之主张。⁷⁷在此意义上，《美利坚志》尚不足说明冈千仞接受了社会进化论。

能够全面而直接地展示冈千仞接受社会进化史观的是《法兰西志》，这部著作明确表明他在“强胜弱败”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认同了社会进化史观。作为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国，有史以来就内外战争连续不断，而且规模之大，常常前所未有，因此法国历史对中国士人和日本汉学者都有超乎寻常的史学魅力。1867年王韬初履欧陆，即“致书法国学士儒莲，谓宜撰成国志”，只因“儒莲未有以应”，才令王韬未能如愿。⁷⁸王韬在欧洲所获对西方历史的理解和感想，与他在《答〈强弱论〉》一文中社会进化论倾向有直接关系。⁷⁹冈千仞不像王韬那样亲履欧洲，他的社会进化论感想得益于另外的机缘。译述者高桥二郎述编撰《法兰西志》缘起：

“余尚就法国史学家曰本的内氏，质问法国史事。本的内氏以法国位欧洲中土，其沿革皆关列国治乱，益于史学尤大。劝余译述。因取法国犹里氏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刊行《法国史要》，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近古史略》，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史》三书抄出其要领，译为一编。仙台冈鹿门好说西洋史事，为余删定成书，书中论赞系于鹿门氏笔。”^[20]

高桥二郎是有相当史学修养的习西学者，他如此言及东西方史学观念的差异：

“东洋各国史书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天地变异，而至国势民情则间多缺略。西洋

史篇不止叙历代治乱，兼记民间事情，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东洋人轻视不为意者，亦大书特书，以表人文之进步。已称曰国史，理固宜然，读者莫以为异焉。”⁸⁰

是高桥二郎还是法国史学家本的内氏选定犹里氏著作作为编译《法兰西志》的原本，这并不重要，值得重视的是犹里氏三部著作均完成于19世纪60—70年代之交，恰是社会进化论在欧洲兴起时期。柯林武德述及那一时期社会进化论思潮对英国史学的影响，写道：“19世纪的后期，进步的观念几乎变成了一个信条；这种概念是一种十足的形而上学，它得自进化的自然主义并被时代的倾向而强加给了历史学”，并且认为社会进化史观的盛行“无疑地在18世纪把历史作为人类在合理性之中前进并朝着合理性前进的这一概念中有着它的根源”。^{[21](P164)}显然犹里氏的史学著作已经显现出了这样的时代性倾向。最典型的例子见《法兰西志》卷三对于卡佩王朝（987—1328年）的十字军东征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总结性评述：⁸¹

“自十字军兴一百五十年，师出九次，-----至是各国丁壮苦征发，老弱病运输，所耗失累巨万，财本不给，公私困弊，天下无复谋再举者。而军兴以来，东西贸易盛行，锦帛麻苧木绵甘蔗梅桑等，皆西北诸国所不产，相传转植，民赖其利。各国商贾始航亚细亚智耳港，买玻璃又得一玻璃镜-----嗣后百工技艺资彼此所长，益极其精微，欧土文明日开实原于此云。”⁸²

西方历史著作在十字军东征这场绵延两个世纪并且以失败告终的宗教战争背后挖掘出如此不期然而然的历史结局——造就欧洲社会文明的进步，这对于东方史学者而言极富刺激性。不同于西方在美洲殖民有文明扩张之意义，在十字军东征战争背景下展现的欧亚交通的历史场景，令日本汉学者联想到日本与东北亚诸国交通的历史。评者谓：“我邦上古文明资于三韩，中古文明资于隋唐，庆元以来文明资于汉学盛行，近世文明则资于欧米通交。无非资于海外也，论时势者当首着眼于此。”⁸³冈千仞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交通予以无条件肯定，即便有战争之背景或以战争为途径。这就导致冈千仞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时，关于正义性的辨析完全为关于社会“人文之进步”的判断所遮蔽。冈千仞显然有感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法国和欧洲全面欣欣向荣的英雄主义的时代，他在卷三史论中虽然未提及十字军东征，但盛赞卡佩王朝路易九世“护民权”，⁸⁴腓立四世“谕国人自由权利”，所谓“欧洲各国所以日趋旺盛者，在于此也欤？”法国带动了欧洲各国民权事业的发展，法国社会又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空前的机遇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气象。他叙述：

“是以其挺然负异者，不问为农、为商贾、为百工、为学术技艺之士，各为其所志砥砺志节，砉磨巧智，勇往猛进，无所顾虑，争出轨轴，以发达其特有独得者。人人得自由如此，故虽世有污隆，时有治乱，世道人心日愈振作，犹枯苗得时雨，沛然无之能御焉也。”⁸⁵

如此描述表达了冈千仞对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之时代精神的赞赏。人类的战争扩张行为带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也带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冈千仞如此明快地接受社会进化论，实源于在战争发生的动机以及战争对人类“用强”精神的激励的理解和感想方面。在这方面，日本士人普遍有不同于中国士人的立场。如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动机问题，评者谓：“勇为君父则义，死为真神则信；义所激水火可投，信所凝白刃可踏”。⁸⁶如第二次东征虽然有“此役暴兵三年，所失巨万，无功而还”的结局，⁸⁷但评者仍有感于“佛国志略云，各国兵士戍圣墓者，以武官兼僧职被兵连年，布袍尘垢，颜色如煤；每临战阵，宗教炼心胆，兵甲固身体；陷危地愈勇，遭劲敌愈锐，以死誓神，志操凜然，得誉当时”。⁸⁸在将人事付诸道德之诉求时，中国士人注重对事情本身在“仁”为准则下的追究，而将个人行为的道义追究置于从属之地位。这是中国士人面对社会进化论在观念上无法也无力沟通之原因所在。⁸⁹至于日本士人则更侧重于对在事情进程中人、尤其个人的道义完善性的追究。这是日本士人易于接受社会进化论和个人主义——包括个人自立自主的观念原因所在。

日本士人对于西方宗教战争中所折射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多能予以同情的理解，因而冈

千仞在战争问题上作出直面儒学的挑战，并非出奇之举。卷四瓦罗亚王朝（1328—1589年）是法国内外战争不断的战乱时期，⁹⁰在该卷的史论中，冈千仞力图就社会进化论、尤其战争在社会文明进化中的意义作出富有创意的阐释，他写道：

“凡物有抗抵力，而后可以神其功用也。电气之递书信于瞬息之间，以燥湿二质为之抗抵力也；汽气之走舟车于万里之外，以水火二质为之抗抵力也。异哉，抗抵力之神功用也。夫兵者，人民之抗抵力也。余读前后加颁的氏记，而后有知用兵之奏功用于天下极为神异也。盖前加颁的氏承战国之余，仅守封域耳，而十字军一兴，横行万里绝海，出入百战死地，眇然如不少关意者。欧洲全势一变，地中海长为百货辐凑贾舶群逐之地矣。后加颁的氏有英法百年之役，而后讲究航海，发明火器，兵锋百炼，万国辟易，遂至往来亚弗利加南部，通商赤道以南之蛮邦。其它日赞亚米利加独立，开五州交通之一大伟业者，亦唯源于此二役振起人民抗抵力也。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用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祥云庆星乎？”⁹¹冈千仞挑战儒学非战观的理论仍然是建立在“人文之进步”“理固宜然”的基础上。尽管如此，“抗抵力”说的提出，表现出他力图使理论建立在具有普遍阐释价值的背景下，即“抗抵力”现象不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且其存在的价值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是相通的。这一点恰与柯林武德所述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史学中的影响表现相符。评者称道冈千仞这种富有创意性的阐释为：“论兵之功用寻常套论，唯说出抗抵力三字奇创惊人”。⁹²

历史观及“强弱论”这种应对时势的立场态度问题从来为儒学的重要话题，因而西方进化史观与竞争的立场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社会进化论及该理论的构成本身，对于具有儒学文化背景的中日士人而言应不乏吸引力，但是对于中国士人以及象冈千仞这样的日本汉学者，社会进化论的魅力主要是来自它的“致用性”，即它足以使传统的“用强”说者从道德论的压迫下获得解脱。冈千仞在《法兰西志》中和严复在《天演论》中对社会进化论的反应有可比性。在《天演论》中，“严复强调的是竞争（一种确定无疑的活力）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形势下，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因此，‘爪牙用而杀伐行’的形象描绘非但并未使他沮丧，反而使他兴奋”。^{[22](P41)}而冈千仞则以“抗抵力”说表达他对竞争价值观的兴奋，即一名激烈的传统“用强”说者在社会进化论中得到回避追究战争正义性的正当理由后的兴奋。

从社会的“人文之进步”“理固宜然”的意义上承认战争的时代及历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丧失对战争本身的评价为代价的。“人文之进步”“理固宜然”只是使冈千仞可以回避对战争正义性的诉求，而不是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非议儒学非战观的同时，作为汉学者的冈千仞无意成为一名好战论者，尤其是对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战争，他并非无条件地赞同。因此在卷三卡佩王朝史论中，他回避十字军东征而盛赞路易九世之治绩，以及那一时代的成就，而在卷四瓦罗亚王朝史论中，则又回避路易九世诸人而盛赞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历史价值。冈千仞以割裂评价战争与战争发动者的方式，表达了他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的某种保留。他在卷六波拿巴王朝史论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即对拿破仑之“武功”作了下述批判：

“拿破仑起一武冕，取埃及略以太里（意大利），挫普（普鲁士）澳（奥地利），胁英（英国）鲁（俄国）。能使欧罗巴全州靡其威风，规模之宏，威武之赫，亚历山（亚历山大）塞撒（恺撒）以后一人而已。余特惜其徒恃攻城野战之力，呈摧坚挫锐之威。战斗愈胜，而国力愈疲；威武愈扬而智力愈穷也。余观古来英雄用兵，立大功于天下者，必用诸不得已者也。何谓不得已，禹之行水是也，禹疏江淮河汉，渚彭蠡巨泽，皆因水势之不得已者而疏导之也。仑之用兵于埃及、以太里则似矣；若夫英鲁普澳，皆与法匹敌之国，而仑徒以兵力与之角逐，余未知其出于不得已与否也。-----而仑计不出于是，将尽取天下之敌己者，-----莫斯科之败，一挫不振，-----皆由用兵不得其道而已。嬴秦并六国，实用远交近取之策；司马晋之一三国，先坚吴交，而后出兵于蜀，此皆因天下

之不得已者而疏导之者。故功成之日，天下贴然，无不服其神算也。”⁹³

从表面上看，冈千仞站在社会进化论立场对儒学作了折中，以“不得已”用兵为准则论战争之合理与否，以“因水势之不得已而疏导之”喻“英雄用兵”。战争作为“疏导”人类社会相互间矛盾冲突的手段，虽有势不得已之义，不过冈千仞是主张在积极主动的意义上加以应用，所以他批判性地评价拿破仑之“武功”，只是非议其用兵缺乏策略而已。拿破仑作为近代人物，其“武功”在“人文之进步”意义上的历史价值在当时尚无缘彰显，非议拿破仑之“武功”因此而有成立的可能，但从动机而言，冈千仞则欲藉以淡化全书言论的倾向，即如果不能就正义性加以评说，那么也只能以成败论英雄来非议拿破仑的“武功”了。⁹⁴

对拿破仑的评判，暴露出象冈千仞这样的汉学者在接受西学方面的缺陷。冈千仞自己似乎也感觉到社会进化论理论上的某种不足，但其知识结构决定他无力也无意在理论上加以解决。汉学者满足于理论的“致用性”——社会进化论足以给予传统“用强”说者一个表面圆满的解说。这样的缺陷不同程度的存在于《法兰西志》的所有史论中。

对于社会进化论问题，日本的洋学者比汉学者有更全面而理性的理解。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就力求科学地界定文明的概念，他说：

“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23](P33)}

在他列举四种被误认作文明社会状态的例子中，第三种即针对像冈千仞那样绝对接受社会进化论的立场：

“（人民）生活情况虽然自由自在，但是一切毫无秩序，也毫无权利平等的气氛，大欺小，强凌弱，只凭暴力支配整个社会。例如，昔日欧洲的情形就是如此。这能叫做文明开化吗？文明的种子虽然在这里开始萌芽，但这种情况依然不能叫做文明。”^{[23](P32)}

福泽对于“昔日欧洲”的战伐，虽然承认其有促进“文明的种子”“萌芽”的作用，⁹⁵但不认为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应有的状态。

5 琉球事件与冈千仞及日本汉学界邀请王韬访日

1870年代后半期以来，明治政府强化禁止琉球与中国交通的措施，在此背景下，日本专管琉球事务的外务省官员、前萨摩藩藩士伊地知恒庵“着《冲绳志》五卷”，1877年秋有多名著名汉学家为之作序。中村正直是以儒学出身而接受基督教的洋学者，他在日本对外关系问题上始终坚守反“强胜劣败”的道德论立场，对弱者抱有深刻之同情，他认为“我邦以大自处耶？比中华则小矣，以小自处耶？比琉球则大矣”。“观于古今万国史，大国恃强骄傲自用，卑视他邦，不转眄而亡者多矣，而小国乃能得自立自存，非小国之独能智也，以其无所恃而自有合于保国之道尔”。⁹⁶表明他对日本政府在琉球问题上的扩张政策持保留态度。重野安绎虽承认“冲绳自通汉土，受其封爵，服其衣冠，髻簪髭须尽拟汉装”，但认为无论在种族、语言还是在交通关系方面，琉球都与日本有更深刻的历史渊源，他指斥琉球政府“自以天孙序世系，而不问其种族同异；自以冲绳冒国名，而不察其语言所由；反欲与殊方异族之汉人昵比，抑又何心哉”。⁹⁷冈千仞也作有《〈冲绳志〉序》，其立场虽与重野安绎一致，但他完全从现实的国际关系角度论证明治政府对琉球措置的必要性，具体指出：

“俄罗斯之于桦太，疆域悬绝，风马牛不相及者，彼幸我不限疆界，悍然略夺。

况琉球邻清国，又尝受其封册，一岛两属，名号不正，若使米利坚当时学俄罗斯所为，则其地不羽而飞也矣。圣朝有鉴于此，其新发大号，拜岛主为藩主，置兵营，严守备。庶几名分一定，备虞有方，可以绝狡焉者之望也。-----以桦太覆辙为戒可也。”⁹⁸

16世纪末丰臣秀吉“先据朝鲜，直寇辽左，以图天下”的大陆扩张主张，^[24]在沉浸于

抗御西方入侵、卫护国权愿望的近代日本社会全面复兴。亚洲各国遭遇西方入侵的共同命运，为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提供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振兴亚洲免遭西方侵略，所谓“兴亚论”在日本社会应运而生。在琉球事件导致中日两国外交冲突日趋加剧的1880年，有政府背景的以“兴亚论”为宗旨的“兴亚会”和以振兴儒学为宗旨的“斯文会”相继成立。这两个组织成员重迭，反映了“兴亚论”与日本汉学界的关系，冈千仞就是一个典型。他的《法兰西志》卷六史论就有鲜明的“兴亚论”色彩，如讨论拿破仑用兵欧陆的是非得失，就最终落脚于与丰臣秀吉用兵朝鲜的对比，他写道：

“世有以我丰太阁比仑者。太阁鞭挞群雄，戡定乱略，震威于海外，殆不让仑武也，而掌握大权，富贵终身与仑异。其成败者无他，其经营四方，先智略而后用兵也。”

99

日本国内有以拿破仑比丰臣秀吉者，冈千仞甚至认为如此对比有损于丰臣英名，不惜以能否“富贵终身”论二氏之成败。如此勉强比较，致评者质疑，然冈氏固执己见，振振有辞，评者不厌其详作如下记录：

“天爵草是篇，以稿本示，余疑引丰公颇不伦。天爵笑曰，我苦心点出丰公以结是篇，亦尊内贱外之意，不然何异寻常洋学者流。译洋书者亦可以知用心细密也。”¹⁰⁰ 冈千仞对丰臣崇拜至深，以至论着中意气用事，由此可知其属于“兴亚论”中的激烈者，《〈冲绳志〉序》的言论也表明了这一点。琉球“一岛两属”之政治地位不被国际公法所承认，易为西方列强借机侵占，日本并吞琉球有利于亚洲大局。为打破中日琉球问题的外交僵局，1879年以私人身份携伊藤博文函来华的竹添光鸿，即以此说向李鸿章陈述日本并吞琉球之合理性。¹⁰¹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国权扩张态势面前，清政府处境极其被动，李鸿章苦于中国的主张得不到西方列强的同情，不能不检讨清政府1874年处理中日台湾事件缺乏国权观念，随后有“添购铁甲船”之举，¹⁰² 但是对于丧失琉球宗主权的既成事实，则只能以“若无办法，听其自去，虽是不了之局，中国始终不失身分”的消极态度对待。¹⁰³ 李鸿章此一态度由来已久，当1878年春夏之交驻日公使何如璋主张采取强硬立场交涉时，李鸿章即以如下理由予以反对：

“是今日日本阻贡之举，中国之不能不与力争者，理也，情也。然迩年以来曾未认真议及者，盖亦有故。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迹于日本，---虽欲恤邻救患，而地势足以阻之。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瘦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¹⁰⁴

虽然认识到中国无力承担保护琉球的职责，却又不可能作出放弃琉球宗藩关系的决策，这种态度决定中国政府在琉球事件中陷于消极和无奈是无可避免的。¹⁰⁵ 1878年间李鸿章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之恼怒可想而知，他寄希望于日本困于国内局势而慑于中国干涉，在琉球事件中知难而退，¹⁰⁶ 因此他仍积极谋求中日关系友好。“光绪四年戊寅六月”，李鸿章为在日本对华外交界有相当活动力的汉学家竹添光鸿的中国游记《栈云峡雨日记》作序，曰：“方今两国文轨相同，往来相通，畛域之分，非复曩时比。继自今有踵居士而来游者，余将东饷速客，延之上座，一叩其胸中之奇也。”¹⁰⁷

《栈云峡雨日记》在1877—1878年间获得中国上层士大夫广泛好评，以及李鸿章上述序文，足可见琉球问题直至1878年夏尚未深刻危及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关系。1878年12月7日，《万国公报》以《论琉球国不应臣服中朝》为题转载日本报纸舆论，称琉球人“欲央请中朝钦使从中关说，准其往来中东两国，皆通贡献之礼。日本人闻之深以为诧，有万不令琉球人自行其便云云”。¹⁰⁸ 此后中国才逐渐形成从政府到上海、香港的公共舆论关注琉球事情的局面。1878年间吞并琉球在日本几成事实，然中国尚无甚反应，正因此日本汉学界

酝酿邀请王韬访日才有可能。¹⁰⁹

日本汉学界联手邀请王韬访日缘起于栗本锄云、中村正直、重野安绎诸人应书商之请训点王韬的《普法战纪》，动议邀请的时间在 1878 年 2 月间。¹¹⁰ 栗本、重野为主要邀请策划者，而冈千仞则与中村正直诸人都在协同地位上。日本汉学界名流请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作函为介，并以曾在香港拜访过王韬的寺田弘致邀请之意，此后双方“文书往复达数十通”。^{[25](P392)}于此可见除途经香港的日本拜访者外，直至 1878 年，王韬与日本汉学界没有值得重视的联系。仅就冈千仞来说，他与王韬此前尚有值得一提的文事渊源。《法兰西志》卷二中评者的评语提到：“王韬称《米利坚志》为深识远虑，稔欧洲事情”。¹¹¹可知他在 1878 年前就已读过《美利坚志》，评语辗转传到日本。1878 年间冈千仞对王韬的知己之感胜于日本其它汉学家，对王访日抱有特别的期待。1879 年 2 月王韬访日尚在既定未定之时，冈千仞通过赴欧途经香港的佐和东野致意王韬，具体内容从其《送佐和少警视奉使于欧洲序》可知，文中有如下值得重视的内容：

“十字军踵起，地中海为战区，四方辐辏，人智大开。英法之战亘百年，始制巨舰大炮，运货物于洋海之外，西班牙寻检出东半球，悟地体圆转之理，遂南向开喜望峰之海路。华盛顿挫强英，以合众部独立。英人无所用武，遂东其锋，蚕食印度，直逼东洋各国，局面丕变，规模日大，意气益锐，犹火始燃泉始达，沛然不可遏抑。既而拿破仑勃兴，尽全欧智力，竞雄于万丸雨注之下，精者愈精，锐者愈锐，胆力日大，操守日牢，其于天下之事，眇然无一足为者。-----而考其所以至此，无一非成于积百战淬励之功之余者。传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非耶。-----岁二月，大警视川路君奉命使于欧洲，我友佐和君东野以少警视副之，征余序言。顾余求变通之说而未得者，将何言。近读香港王紫诠《普法战纪》，服其虑之深而其思之远。东野航过香港，见紫诠质以余言。紫诠游欧洲，谙海外事情，必知所以变而通之。”¹¹²

上述关于欧洲中古以来之历史叙述，直至近代东方诸国面临国际环境的感想，均沿续了《法兰西志》中的观点。“东野航过香港，见紫诠质以余言”，反映冈千仞读《普法战纪》后深有感想。¹¹³

虽然没有史料说明王韬对《送佐和少警视奉使于欧洲序》的反应，但有史料表明该文在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1880 年夏出版的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下同）第一篇《论公法》关于西方中古以后历史的理解，不但与冈千仞基本观点如出一辙，而且许多文字有脱胎于冈千仞文的痕迹，如以下一段：

“-----其后英、法斗战，延及百年。用是苦心焦思，始制巨舰大炮，狎风涛之险，备战守之方。西班牙检出西半球，悟地体圆转之理，遂开海道以连于亚洲之东南洋。及华盛顿崛起自立，合众部以挫强英。于是英人乃东并五印度，直逼东洋诸国。每经一战，局势诡变，人材挺生，各国皆发奋有为，讲武通商，力筹强富。既而拿破仑第一兴于法国，用兵精锐，穷全欧之智力以相竞，卒莫敢撓其锋焉。”¹¹⁴

清代雍正帝曾以中国疆域是一渐进扩大的历史过程，说明满清王朝统治中原的合法性，¹可见在文明扩张的意义上认同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并不存在绝对的政治障碍。王韬《答〈强弱论〉》、郑观应《论公法》、沈毓桂《中外往来有益论》等都曾先后以中国疆域与中华文明同步扩张的史实说明近代西方文明在东方和世界范围的扩张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华西方传教士传播社会进化论，集中在宣扬通商自由、传教自由之主张，至多涉于文明扩张论的意义。如李提摩太 1881 年论述西方殖民地开拓的起因：“泰西各国造机器以助五官，遍地球以兴民利，似乎无他新法以得新地矣。惟有志格致之士，考天有星辰，地有化学，潜心研究，自必另有妙理可悟、新界可得矣”。沈毓桂于 1883 年对李提摩太此说作如下阐发：“即如英国炮利船坚，货财充牣，甲于天下，现计受其辖制者约居地球五分之一，其所以开拓诸境界而启

辟夫新疆者，果何由而得此？实由夫格致之一学也；-----有心人每忧之，乃持尺寸之见者，辄谓我中国-----治国之道尚德不尚力，以王不以霸，奚必效泰西之处心积虑，凭格致而工机巧，藉以谋新界之得耶？然而为是言者亦乌知今日之时势乎？夫世事一争局也，强凌弱，富压贫，又人之常情也。故欲不受制于人，而并可以制于人，则非自强不可；而欲自强，则非谋富不可；而欲谋富，则非格致不可”。¹¹⁵ 思想方法基本未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围。近代中国最早而且较为全面介绍西方文明进化思想的著作当系江南制造局刊于1885年傅兰雅译编的《佐治刍言》。该书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之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模拟于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中村正直《西国立志编》。傅兰雅认为人类社会由“野人之国”向“文教之国”进步，基本上是“愈进愈上”的过程。傅氏视战争为“野人之国”的残遗，“用兵之事，虽人人皆知有害于国，终无一定之法可以免之”，承认近代西方各国尚未进入完全的“文教之国”。所谓“文教之国，亦有因文教尚未成功，至有用兵交战之事，即如往年美国南北交战，及德国与法国用兵，皆近来之明鉴也。若文教造到十分地步，亦何致有此种残忍争斗之事耶？”傅兰雅的文明进化说充满了对“强胜弱败”自然法则的批判，即便是肯定“竞争”的观念也限以道德论，所谓：“人当用力争先，各求利益，以养其身家性命，固已。然亦不可故意损人，专图益己。”¹¹⁶ 总之，冈千仞的言论为在华西方传教士所不能及。至于郑观应个人，尽管商人身份令他“对西洋之兴趣，则集中于各国所以致富强之原由”，^{[27](P435)}然在1880年能如此明晰地悟及战争与西方各国致富强原由的关系，似尚欠缺必需的个人的知识准备。《易言》出版后在社会压力下作者被迫收回，则从另一方面说明郑观应在《论公法》中的思想非得自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事实。

郑观应《论公法》中相关文字脱胎于冈千仞文显而易见。1879年王韬访日往返两次逗留上海，对《易言》成书及出版有重要的影响。《论公法》一文背后王韬的影响，以及王韬支持《易言》出版的动机，虽然都是有待探求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即1880年是王韬有意使郑观应在《论公法》中引进冈千仞的言论，为其在国内传播社会进化论投石问路。¹¹⁷

值得提及的是《易言》得到当时驻日公使馆随员黄遵宪的好评，他于1880年将该书推荐给朝鲜访日使节团，朝鲜政府于1882年壬午事变后将该书翻刻出版。¹¹⁸ 黄遵宪对《易言》的好感，并不能说明他忽视了郑观应异端思想的存在。他对《送佐和少警视奉使于欧洲序》曾作过如下评语：

“西法有必不可学者，有可学可不学者，有急急应学者。论物产之富，人才之众，风教之美，吾皆胜于彼。所不及彼者，汽车、轮船、电线及一切格致之学、器用之巧耳。彼挾其所长以务财训农，以通商惠工，以练兵讲武，遂坐收富强之效以凌轹我。彼百战积累，不知费几许金钱、几许岁月而后能者，吾学之而旦夕可成，此盖天之所以启我也。于此而犹不图奋发，是甘于自弱矣。噫！”^{[28](P153-154)}

评语对于贯穿该文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不作任何响应，批评之意自在不言之中。冈千仞对黄遵宪的评语也甚不以为然。《藏名山房文初集》在该文后收录黄遵宪评语时就将此部分内容完全删去，只保留最后一句仅涉文学的评语：“矫健磊落，光烛星辰而上，气引江河而下。此题古人所未有，而文乃不懈而及于古”。¹¹⁹ 不过等到后来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时，也明确表白其社会进化论立场，他的思想文字显然带有脱胎于日本汉学者的痕迹，见卷四《邻交志上一》的卷首史论：

“外史氏曰：余闻之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力而夺人巧。自法国十字军起，合纵连横，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比之罗马一统时，其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云。其意盖谓交邻之有大益也。”¹²⁰

1894年严复译介《天演论》后，中国士人才表现了对社会进化论的明朗态度。从中国士人

接受社会进化论思想的线索来看,《天演论》是在前期《易言》、《日本国志》相关言论的方向上的延伸和发展。

6 冈千仞、王韬与“兴亚论”

1878年9月何如璋开始向日本外务省交涉琉球事件,10月递交照会,称日本“禁止琉球进贡我国”为“背邻国,欺弱国”的“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11月21日,日本外务省复照中国公使,要求何如璋书面道歉,如不撤消前言,即不再商谈。^{[29](P160,161)}琉球交涉由此形成僵局,中日矛盾激化。王韬既在此背景下决定访日,必对与日本人交往应如何面对琉球问题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他于1879年3月23日离香港,27日抵上海,后回乡,4月中旬再抵上海。¹²¹日本对琉球“废藩置县”既成事实恰在此际。¹²²4月下旬王韬赴日动身在即,正逢竹添光鸿负琉球事之外交使命过路上海北上天津。¹²³王韬与竹添及日本驻沪领事交往频繁,他为竹添等送行的热情所感动,谓:“余东游实以此为发轫,而东国之贵官文士待予殷拳若是,亦可见两邦之亲睦矣。”^{[30](P392)}由此可见王韬对中日两国琉球问题的政治矛盾置而不论以实现其访日的用心。他在日期间忘情于酒色与山水之间,归国后写成《扶桑游记》,通篇未及琉事,正是他的这一既定方针的体现。

然而在1879年之政治背景下,王韬在日期间,尤其是在与冈千仞的交往中,不可避免面对时事政治问题。王韬5月17日抵东京,18日夜冈千仞偕河野通之来访,已解衣就寝的王韬“因重剪烛作笔谈”;21日冈千仞偕栗本锄云再度来访,“出其所着文稿见示”,并告“近又译《英志》,已得二卷”。双方在笔谈中是否涉及琉事不得而详,但冈千仞向王韬热烈陈述了“兴亚论”主张:

“方今宇内形势,以俄为急。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敝邦与之土壤毗连,尤不可不悉其情伪。《俄志》之译,为不可缓。先生其有意哉?他日《俄志》若成,明着其利弊得失所在,则五大洲可收之掌握中,何等快事!”

124

“防俄”为日本“兴亚论”最重要之基点,尽管1879年中俄关系因伊犁交涉而趋紧张,但是冈千仞以为“兴亚论”可以沟通于王韬的理由仍然主要是来自《普法战纪》。《普法战纪》书前两篇篇幅相当可观的序文与最后一卷——卷十四的卷末史论,在展望普法战后欧洲及世界局势前景时,王韬都醒目地提出俄国的亚洲扩张问题。王韬的描述表明,他显然为1854—1857年英法联盟与俄国间的克里米亚战争所吸引,兴趣所在则是在以英、俄为两极的世界政治格局下观察时势的演变。他认为克里米亚战后英法联盟有效遏制俄国扩张的欧洲政治格局,将因普法战争而发生有利于俄国的变化。法国的衰败,普鲁士的崛起,英法联盟已不足以在世界范围内遏制俄国的扩张,英国欲遏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不能不借助中国的力量。王韬如此阐述其见解:

“环顾欧洲,-----英欲拒俄势必联法,然英法合并亦只以支持欧洲之大局,阿洲之偏隅耳,而犹恐不能兼顾乎东方也。俄既不得逞其西略,则将肆其东封。俄势日东则其强益甚,举天下之利权尽归掌握。英法至是虽欲争而不得矣,然则必欲牵制乎俄,天下诸国无能当之者,惟中国则庶乎可矣。在欧洲诸国为今日计者,莫若英、法强中以御俄。中国幅员之广过于俄、美、英,而生齿之繁几半地球,近来仿制船炮,技美法精,机器日兴,艺巧迭出,诚得英、法以为助,其强当无敌于天下,于御俄乎何有?此非英、法为中国,实英、法自为计也。不然者,英、法离,普、俄亲,中国弱,东土蹙;普为俄用,遂展雄图;恐法削而英亦将不竞,天下事从此殆哉。有心于天下大势者,当不河汉斯言。”¹²⁵

俄国的扩张问题在《普法战纪》结论部分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俄国扩张只是引出结论的重要论据,而不是结论本身。尽管1861年清廷制定外交政策,以“俄国壤地相接,有蚕

食上国之志”，定俄国为首要敌国。¹²⁶ 同治初年南方士人中“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视“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以俄比秦为常情。¹²⁷ 但是一般而言，同治年间南方士人对俄国并没有特殊的敌视，而是在平等地看待西方列强扩张趋向的前提下谋求“以夷制夷”的可能性。相对而言，他们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抱有更高的警惕，1875年在因日本侵台而起的“筹议海防”中有关于塞防与海防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立场在南方社会是有深刻政治历史背景的。《普法战纪》完成于1873年前，王韬在引用俄国远东扩张的事例时也未予以特殊的谴责。例一，俄国“经营黑龙江一带者已历多年，通商劝农百废具兴，日前之所为弃土者今几视之为重镇”。例二，“观俄国近取日本塞嘉溪连岛一事，则知其有志于东方也。虽以英之驻扎日本公使为之居间力拒，卒不可挽，呜呼，俄之雄图或将于是始哉！”¹²⁸

王韬显然也像冈千仞那样注意到战争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但他所理解的这种关系不是简单持续的进步过程，其中必然有转折性的变化。因此王韬关于历史发展总的规律的认识是循环的，而非进化的。普法战争的结局重新启发了王韬对循环史观的信念，以及对传统文化理想和中国前途的信心，《普法战纪》就是在如此心态下编撰而成，其中贯穿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循环史观。¹²⁹ 所谓“西国之雄法当首屈一指，诘知日中则昃，器满则倾，而颠覆之已随其后也”，¹³⁰ 普法战争的结局不但为国家强弱循环转移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一个最新版本，而且预示将在世界范围发生强弱之势的转移。王韬对普法战后出现俄国挑战英国霸权的局面十分感到兴趣，¹³¹ 国势强弱转移的连带效应令他“所尤深感者，不在国运而在天心”，¹³² 中国命运的转机也在这样的连带效应之中。《普法战纪》指出俄国扩张是中国命运转机的一个可供利用的环节，英国不能不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中国之命运将因此而改观。《普法战纪》的结论落脚在“以夷制夷”策略在新国际环境下的应用将给中国的命运带来转机。

王韬对俄国扩张的关注以及与英国结盟抵御俄国东扩的战略设想，与日本“兴亚论”大有可相呼应之处，可能正由于此，《普法战纪》得到日本汉学家的好评。冈千仞初识王韬，俄国问题即成为热烈话题理由也在于此。然而王韬视俄国扩张为中国“以夷制夷”的重要筹码，抗俄仅是一个策略而已；而冈千仞则以抗俄为首要目的。这决定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是有限的。而且1879年“伊犁事件”、“琉球事件”等发生，早已使王韬在《普法战纪》中关于中国命运循环转机的乐观丧失殆尽，他在日本友人面前并不掩饰这样的心情，其诗曰：

“东瀛清水何漪涟，愁教快着祖生鞭；外人久思逞戈铤，与国方欲修楼船。

与其临事叹拮据，绸缪未雨思绵绵；东南何遽输西北？我欲上问彼苍天。”¹³³

总之，1879年中日关系的紧张，令王韬与日本汉学者间缺乏深入交流所必需的自由轻松气氛。《扶桑游记》和冈千仞《〈扶桑游记〉跋》不但都没有关于王韬如何响应冈千仞的“兴亚论”主张的记录，甚至没有提及《送佐和少警视奉使于欧洲序》一文。对此我们应正视其间的复杂性，而难以1879年间王韬对“兴亚论”主张缺乏兴趣一言加以概括。1879年冈千仞与王韬在许多问题上是有交流的。¹³⁴

7 王韬清华吟馆课题四篇

在1879年的时局背景下访日，王韬自然不会有发表政治问题见解的动机和积极性，不过或迫于某些场合，或在某些场合下情不自禁，他也曾发表过几次涉及政治学术问题的言论，无论是对王韬个人而言，还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而言，这些言论都有其特殊意义。

日本汉学者冈本监辅着汉文本《万国史记》，1879年春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冈千仞、川田瓮江等纷纷为之作序或题跋，王韬抵东京后曾点评重野安绎的《〈万国史记〉序》，¹³⁵ 6月21日冈本监辅登门拜访王韬，双方对谈颇深。《扶桑游记》录有二人间的如下言论：

“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修而学之者，

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冈本近日又着《要言类纂》，就古今言理诸书，综其要而隐括之，皆孔孟遗意。彼以为是说也，遍天下可行也；于泰西学士之言，则独摈之，是亦具特识者。”¹³⁶

若据此言论就得出王韬于 1879 年间已退回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结论，是失之偏颇的。若认为王韬对冈本监辅著述立场的赞扬是深思熟虑的，那就只能说明文化保守主义必将导致王韬与日本“兴亚论”者有更多更积极的共同立场，因为冈本是一名远比冈千仞执着的“兴亚论”者。¹³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冈本监辅著述立场的赞扬，与其说传递出王韬已退回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信息，还不如说这隐含着他对日本崇尚西学西法而违背传统政治道德准则的批判。¹³⁸王韬对日本扩张倾向的批判不以近代观念为依据，也并不意味着他已退回传统的立场。1879 年面对日本“兴亚论”，王韬言论之立场十分微妙而复杂，不能以退回文化保守主义一言以概之，下述未收入《扶桑游记》的王韬在日言论，或者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6 月 7 日王韬出席日本汉学家“清华吟馆”的文会活动，“席上课题四篇”：《华夷辨》、《智说》、《〈地球图〉跋》、《读〈离骚〉》。¹³⁹日本汉学家命题，王韬即兴一挥而就，文章虽因此不免构思草率，但也因此而较多率性自然的成分，6 月下旬《邮便报知新闻》分三次刊载四文，并附重野安绎、藤野海南的评语。刊载时列于首篇的《华夷辨》似乎在四篇中最具重要意义，全文如下：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¹⁴⁰

文章主题不难读懂，即认同被称之为“礼”的中华制度的前提下参与入中华秩序，是“夷进而为华”的唯一标准。王韬作此文自然不是追寻“华夷辨”的经典本意，而是如何以经典为背景阐发满足现实问题解释所需求的新意。而解读《华夷辨》的现实针对性的线索则在其阐述主题的如下细节上。王韬以春秋时代吴、楚两国未认同中原周王朝统治政治权威为例说明“华夷之辨”的“春秋之法”：“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值得关注的不在于王韬援引史事的真实与否，而在于此说所隐含的用意——除了要否定“华夷之辨”有所谓“地之内外”的地域层面上的意义，更要否定它有以“声名文物”为表征的文明层面上的意义，因此下文“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的所谓“礼”是与“声名文物”相割裂的。考虑到《华夷辨》完全架空“夷”是在执掌抑或臣服于“礼”的地位上参与入中华秩序的概念，“礼”与“声名文物”的割裂便被赋予如下两重意义：其一，是否拥有“声名文物”不能成为“夷进而为华”并执掌“礼”的障碍；其二，中华固有的“声名文物”也在可放弃之列。若《华夷辨》以琉球、朝鲜等藩属国问题，或以近代中西方关系问题为背景，完全无须如此的理论设置，对《华夷辨》现实针对性的进一步解读，只有从日本汉学家以《华夷辨》为课题的动机角度着手。

由于明清鼎革造成满清主宰中华的中国社会现实，早在江户幕府时代就已形成日本社会及其儒学界关于中国“华夷变态”的认识，并影响至明治时代“兴亚论”的形成。¹⁴¹《华夷辨》课题的实质隐含日本汉学家要王韬就日本所谓的“华夷变态”问题表态。王韬文章的结尾句：“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包含反诘之意，表明课题的质疑背景的存在。清代中国也只有在认同满清王朝统治，以及汉族发式服饰遭遇改造的现实问题上，需要将“华夷辨”包含的地域和“声名文物”两个层面的意义同时加以排除，如果王韬还不准备放弃“华夷辨”这一传统观念的话。

在《华夷辨》中，我们不难理解王韬在此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而此困境恰又是他所面

对挑战的消极立场使然。王韬无意在近代的方向上放弃“华夷辨”这一在当时中国早已难圆其说的传统观念，但在抱残守缺坚持这一观念的同时，他却又无力面对中国汉民族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和近代以来满汉矛盾激化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困局。《华夷辨》充分表现出王韬在坚持传统的表像下对传统的篡改和背叛。正当中国社会面临着塑立近代国家、国民和民族观念的重任之际，王韬在坚持“华夷辨”的同时，又在地域和“声名文物”双重意义上淡化乃至架空中外之区分，它对传统观念在近代实现创造性转化所造成的障碍可想而知。

对于《华夷辨》的理解自然也可以近代中西方关系问题为背景，不过至少从王韬着文的角度来说，不存在这样的可能，因为课题中另有《〈地球图〉跋》在完全超越“华夷辨”观念的立场上表达了关于中西方关系的看法。在这篇跋文中，王韬承认世界之大，“殊方异域，民生其间者异俗”，“其间情伪相感，利害相攻，强并弱，众暴寡，不知凡几”。王韬既无意将华夷秩序观念推广于近代中西方关系，也无意对现实世界作道德的评判，他是以智者置身局外的立场，大彻大悟地言世间争斗“而莫能有以一之”，是“不知一之者理而已矣”。此说近似于十年前王韬所谓“触斗蛮争，由造物主观之，不值一笑”一语，^[31]笑指世间争斗为好事者不知大同是人类世界必然的趋向，而徒作无谓之举。王韬以超脱掩饰其无力直面近代中西方关系问题对于中国的严酷性，并进一步以无所作为的立场就东方应对西方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侵入问题作了下述表态：

“综地球诸国而观之，虽有今昔盛衰大小之不同，而循环之理，若合符节。天之理，好生而恶杀；人之理，厌故而喜新。泰西之教曰天主，曰耶稣，皆贵在优柔而渐渍之，于是遂自近以及远，自西北而至东南。舟车之制，至极其精，而遂非洪波之所能限，大陆之所能阻。其教，外则与吾儒相敌，而内则隐与吾道相消息也。西国人无不知有天主耶稣，遂无不知有孔子；其传天主耶稣之道于东南者，即自传孔子之道于西北也。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今世之览地球图者，当以是说语之，此之谓善观地球图者。”¹⁴²

面对西方文化侵入，王韬以无所作为的取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立场应对，它包含对儒家的理想和传统文化即中华固有“声名文物”的放弃。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华夷辨》和《〈地球图〉跋》二文思想立场的一致性。

日本汉学家在《读〈离骚〉》、《智说》两题的设计中同样隐含了现实的政治意义，只是没有前两题那样直接，《读〈离骚〉》更兼有探视作者精神世界之意。王韬以屈原和司马迁之遭遇自况，其述屈原的亡国之痛不免包含了他本人对于国事不堪回首之感想，所谓：

“想屈原在当日，以宗国孤臣竭忠尽志以事君，直谏不行，卒至放弃。其时楚已不竞，而庸主相继，溺于宴安，强邻眈视，宗社将墟，其所以痛心扼腕百折而不回者，盖有不可告人之隐在也。”^[32]

然王韬能否对屈原以一死殉故国之忠爱行为予以深切同情的理解呢？《智说》对此作出的下述回答是否定的：

“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煦妪姑息，近仁，亦仁之偏也。慷慨奋发，近义，复仇蹈死，近义，皆未得义之中也。礼拘于繁文缛节，周施揖让，则浅矣。信囿于兢兢自守，至死不变，则小矣。而赖智焉，有以补其偏而救其失。”¹⁴³

因为《读〈离骚〉》与《智说》是同时间完成的作品，不能不承认后者包含否定屈原，也包括否定日本维新志士之人生追求的意义。《智说》确系率性之作，毫无掩饰地表达了王韬从来就选择智者人生的立场——危局之际急流勇退，¹⁴⁴因而它反映出作者与屈原感情上的隔膜，亦即王韬与危机四伏中的中国现实问题间的隔膜。

同一时间一气呵成的四篇文章，尽管题材差距明显，但却表现了统一的人生态度，或处世之立场。《华夷辨》、《〈地球图〉跋》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与《读〈离骚〉》、《智说》对国

家情感的隔膜是相联系的。应该说王韬言论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而具有那一时代中国士人的普遍共性。

面对 1879 年中国全面的边疆危机，王韬显然是陷于思想，或言论的危机，他既不能进一步朝近代化的方向努力以摆脱危机，就只能回归传统寻求出路。然对于从来就缺乏积极认真的人生态度的王韬，他的回归传统却又充满着叛逆。这四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就体现了这样复杂而变幻无定的言论形象，既宣扬传统的信念，却无意于信守传统。王韬旅日言论与日本的“兴亚论”缺乏积极意义上的交汇点，诸如中日联手抗拒西方列强，尤其联手抗拒俄国之东扩等问题。如果说王韬 1879 年的言论对日本“兴亚论”有所影响，那也是在消极意义上的。其一，中国士人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入侵所表现出来的无所作为的立场，激励起日本“兴亚论”者以拯救东亚和东方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其二，面对 19 世纪这样一个殖民扩张意识高涨的时代，中国士人继续以文化的大一统掩饰现实中的满汉矛盾，表现了对民族权利和民族自尊的无视，这使日本“兴亚论”者在“华夷辨”中为其大陆扩张主义主张寻得正当性的立足依据。其三，王韬对代表国家名义的满清王朝缺乏忠诚感的言论，客观上鼓励了日本“兴亚论”者的大陆扩张主义倾向。¹⁴⁵

8 1879 年及其后的冈千仞和王韬

王韬在访日期间，冈千仞始终是同他相处最为亲切并随意的日本友人，这一年，冈千仞年四十八，王韬年五十二，两人特殊的交游情谊究竟是建立在何种意义的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探求的线索还是从交游中的具体事例开始。

“东道有人，决然定行计”，¹⁴⁶这是王韬 1879 年访日的基本背景。虽有“东道”，然邀请方承诺的费用支出必有限度，因此作为支付此笔费用的报知社自然要尽早向王韬明确。¹⁴⁷

《扶桑游记》于 5 月 29 日，即王韬抵东京十余日记道：“特诸同人拟留予在其国中两阅月，缮立条约，有拘束不如人意者。余闻之，始浩然有去志”。^[30]此处所谓“缮立条约”，即报知社关于承担王韬在日活动开销经费问题的协议书。王韬从筑地精养轩移居报知社，即为此协议当即付诸执行的条款。¹⁴⁸

报知社此举令王韬深感有失其名士的自尊，这从“始浩然有去志”的强烈反应可见。冈千仞必极尽劝慰之劳，以至令王韬生发出如此之感慨：“呜呼！鹿门抑何重视仆也？仆自知所学不足为东国诸名士师，聆鹿门之言，不觉通身汗下。人固有自知之明，仆何敢以此自大哉！”^{[30](P427)}从 6 月 21 日王韬致冈千仞函有“阁下方将奉以为师，甘居弟子列”一语，可见 5 月 29 日记冈千仞以“愿留住以尽赏析之欢”劝慰，其中有欲以王韬为师意愿的表达。正因为冈千仞与王韬之间有这样一层特殊关系，才有关于王韬的“好色”而引发两人之间的辩驳。《扶桑游记》6 月 19 日记：“日东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30](P452)}《扶桑游记》中王韬对日本人士质疑的慷慨激昂的辩辞，反映出他率性的风格。不过争论并不象《扶桑游记》所记那样当日即告结束。6 月 21 日王韬致函冈千仞重提此事：“昨蒙阁下以‘登徒佻达’评弟，未识阁下亦识此四字之轻重乎？”他在向冈千仞“一抒其愤懑不平”后，对冈氏进行了一番教导。由此而生芥蒂经公使馆随员沈文莹作介说明始告冰释。¹⁴⁸

冈千仞与王韬交游，在某种程度上执弟子礼，这为我们理解两人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线索。其一，日本汉学诸名家为将出版的《扶桑游记》作序跋，除中村正直外，所有各人对王韬在日期间的游冶狂态均有所言及，然均不如冈千仞那样深入，表明他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王韬本人的自我辩白。而且为了表明王韬将大有作为，冈千仞甚至对王韬归国后向日本友人炫耀得到丁日昌的器重也作了正面的响应。¹⁵⁰尽管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冈千仞在《扶桑游记》跋中言论的真诚信，¹⁵¹但它在诸多方面对王韬表现出过度宽容的同情性理解，只能

以冈氏在某种程度上对王韬执弟子礼事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二，即使在王韬离日本后，两人还信函往来频频。¹⁵²对比其它日本汉学家，可见两人关系不同寻常。1880年6月17日王韬致函冈千仞称：

“成斋久无信来，弟迭奉万言，竟未得一字。辗转思之，殊不可解。弟曩所属望于成斋者殊厚，今落寞如此，殊令人叹息不已。便中请为弟婉词问之。”

1883年3月6日王韬再次致函冈千仞：

“栗本锄云、重野成斋、西尾叔谋、小牧樱泉，此数君子者，皆弟深相结契，别离虽久，梦寐难忘，一别三年，并无一字。龟谷省轩两通尺素，今亦久绝音问矣。”¹⁵³在日本汉学名家中何以独有冈千仞有师从王韬的意愿？原因主要在文学方面。王韬访日期间，在1879年5月21日聚会上，重野安绎曾以魏源比王韬：

“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默深所著《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30](P413)}

重野安绎在《〈万国史记〉序》中曾对魏源有过尖锐的批评，因此当他以魏源比王韬时不能不有这样的说明。¹⁵⁴而在旁的冈千仞则对以魏源作比评价王韬另有一说：“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重野安绎、冈千仞围绕魏源的言辞隐含有两人源于文风气质及人生际遇差异而来的不同见解。恰如王韬评价：“鹿门慷慨激昂，中有血性。成斋秉纯粹婉笃之性，而具芬芳悱恻之怀”。¹⁵⁵冈千仞与王韬在文风上同归一路，日本汉学家认识此点，并均以二氏比南宋的陈亮。如1879年龟谷省轩论王韬：“人中之龙文中虎，弢园先生即同甫；张胆明目论时机，赤日皦皦披云睹”。¹⁵⁶日本《明治名家文评》则论冈千仞：

“先生之才，不若竹堂；先生之学，不若盘溪。然先生之气力则有过于之，其豪宕、奔放不胜言，乃同甫之流者，可以人龙文虎誉之。”¹⁵⁷

文风共同的背后是两人有十分相似的人生感遇，易生相契相知的共鸣。冈千仞相对于其它汉学家对王韬有更多同情理解是自然的。文风上冈千仞引王韬为同调，对其才情充满仰慕之意，称他：“嬉笑怒骂无不成诗，下笔吟哦，汨汨然自在流出，惟觉平易，不少艰辛，是真艺林独步，文坛壮观”。^{[30](P451)}在人生际遇方面他也独能体会到王韬游冶之狂态乃“其心独苦”，有“余于先生，固悲其命穷矣”的感慨。^{[30](P514)}

1878年冈千仞在明治政府修史局协修职位上遭免，¹⁵⁸免职固然加深他“无所用于当世”的不平之感，¹⁵⁹但更主要地还在于强化了他视著述文字为生命的寄托。1881年冈氏五十岁，正值知天命之年，这一年他自费刻印旧作集刊《藏名山房杂著第一集》，作序文表达绝意仕途、视著述成就为此生唯一追求的心情：

“顾余当圣朝隆兴、义旗四起之时，埋没奥羽丧乱之中，不能策名廊庙，以功名事业自奋。中罹目疾，两眼昏昏，医药无效，日月川逝，齿发老苍，渐无意驰骋当世。士负超世之志，不能有所为，而又无一撰着期传于百年之后，此四十、五十而无闻者，独无愧于此生乎？”¹⁶⁰

如此绝意仕途的心情，想必于1879年冈千仞已向王韬坦露，故《扶桑游记》有所谓：“鹿门性豪爽高亢，以友朋、文字为性命，务欲传其名于千秋而不使徒死，以为百年事业所系。故一生精神，悉注于是”。¹⁶¹1879年后冈千仞与王韬关系的维持，应是以冈千仞追求个人文学成就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的。

回香港后王韬有意编辑刊印《弢园丛书》，欲将冈千仞文稿收入。¹⁶²1880年春冈千仞文稿四卷五十篇文经王韬“一一付评”后寄回东京。王韬关于冈千仞文稿有如下总体评价：

“鹿门之文五十篇，乃其毕生精力所萃，其佳处在胎息深厚，词句矜练，识见透辟，议论畅达。所不足者，有时好为奥古，而失之晦塞。今以奔走余暇，披览数过，并为加墨，有复沓处不惬鄙意者，妄为删之，想鹿门以予为文字知己，必不怪也。本拟

改后令小胥钞出付手民以问世，俾中国人士得读东瀛文字，以友人匆促解缆不果。以俟鹿门可付副本来，余定当为之排印也。”¹⁶³

当年4月17日，冈千仞在与黄遵宪的笔谈中，如此谈及对于此事之感想：

“紫诠氏还仆文稿，一一付评，曰在香港排印，宜写一本再寄。紫诠先生何所取而为此事，真不可解者。-----惟仆文庸劣不当半文钱者，若王先生果取仆文，命刻[工]并刻，贾无所偿。唯[王]先生恳恳至此，[真]知己。”¹⁶⁴

《邮便报知新闻》称：“我国之文章能够刊行于清国，广其传，乃鹿门先生之殊荣”，¹⁶⁵冈千仞自然愿此事成真。1880年5月14日王韬致函冈千仞云：“比来屡奉瑶华，如亲晤对，-----大着诗文，日夕展读，一俟稍闲，即当刊布”。这表明冈千仞曾及时将文稿抄录寄往香港，但却没有下文。

笔者没有掌握足以说明冈千仞著作在香港刊刻搁浅原由的史料，¹⁶⁶不过这样的结果丝毫没有影响他同王韬的关系。1880年秋冬冈千仞游北海道，从他在旅途中得到《蕤华馆诗录》而作怀王韬诗，以及他回东京后即寄书王韬表达欲一游中华之心愿，都表明他对王韬感佩之情没有任何变化。¹⁶⁷冈千仞于“辛巳（1881年）病眼稍复”，¹⁶⁸他没有继续写作1879年已经写就两章的《英志》，而忙于整理旧作。其一，将多年积累的旧作数种，包括1880年记北海道行的《北游诗草》，以《藏名山房杂著第一集》为名付刻；其二，将搜集成册的维新运动史料，“删其繁杂，仿纪事本末体，设题分篇”，着成其最重要的史着《尊攘纪事》。^[3]《尊攘纪事》的成功，激励冈千仞紧接着完成《（订正）尊攘纪事补遗》。¹⁶⁹后者交付出版当月，1884年5月29日，冈千仞筹划多年的中华游历成行。

1884年因中法战争而抱“兴亚论”之信念赴中国的日本民间人士甚众。是年5月战争局势正在酝酿中，怀有文学期望的冈千仞恰逢此时来到中国，乃是巧合。与放弃以经世致用为方向的《英志》、《俄志》的撰述相一致，冈千仞不再有当年“兴亚论”之抱负和热情。他在此之前专心整理旧稿，已隐含欲对个人生活作一转折性总结的心情。关于此点的证明是6月30日他在苏州第二次拜访俞樾时的问答录：

“访荫甫先生辞别，且请反棹日受教门下。¹⁷⁰先生忧法事，问何所归着。余曰：小人好谈当世，所呈法、米二志，《尊攘纪事》是也。后悟此事有命，且天下之事非一书生所能了，断然绝念于此，以温旧业为事。先生忻然曰：书史为遗老之具，极是人生乐事。”^{[33](P45-46)}

此时冈千仞已不再“有志于修辑国史”，^{[30](P456)}他“以温旧业为事”的用意，可在冈濯1919年追忆冈千仞1884年游华的文字中得到理解：

“往年先生携其所着米、法史以下数百卷游于汉土，先航上海，馆广业楼，曰：吾将质吾文于南北大家。坐楼上删润旧稿凡百五十篇，分为十卷，名曰《藏名山房文》。濯时从游在侧，缮写往往至夜半。”¹⁷¹

游华的首站以王韬所在地为依归，因经费困难而放弃游曲阜，然仍不惜专程赴保定拜访文章大家张裕钊。^{[34](P289)}类似的事例都足以说明冈千仞游华之动机主要是对文学的专情。尽管“无意驰骋当世”，然随着中法战争局势的严重化，作为性情中人冈千仞仍然是情不自禁地陷入时代的旋涡，因“兴亚论”之热情复燃，而在中国慷慨激昂地“驰骋当世”。¹⁷²因而，他的《观光纪游》出版后是作为“兴亚论”著作流行于日本社会的。^[35]

在现实而具体的中国社会大环境下重新审视王韬，冈千仞对王韬已经有了不同以往的新感想，¹⁷³尽管如此，他对王韬文学才情的仰慕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在赴京津的旅途中，他读王韬新赠的《弢园文录外编》，仍情不自禁地赞叹：“其论海外大势，剴切确当，大快人心”。¹⁷⁴冈千仞与王韬的关系，文学的吸引为主要，观点的一致性并不居首位，文学才情上的共通性消溶或掩盖了两人精神境界差异及政治观点分歧所造成的距离。不过，这种关系仍表现出双方欲搁置或超越政治观点分歧，实现双方都感到愉悦的文事交往的刻意追求。这种

刻意追求，我们在近代中国文人与日本汉学者的交往中亦屡见不鲜。¹⁷⁵

冈千仞 1884 年访华对中国、对王韬新增了失望感，他与王韬的交往在 1885 年后虽仍维持但已趋于冷淡。1887 年冈千仞刊印《观光纪游》，曾寄三十本委托王韬“代售”。在《与冈鹿门》函中王韬对《观光纪游》作了如下的评价：

“游记所见者大，议论纵横，上下时事，目光如炬，忧国爱民，有慨乎其言之者，诚杰作也。惟词太径直，时触忌讳，考订舆地舛谬亦多，惜未先寄弟处代为校勘。”¹⁷⁶ 王韬对冈千仞在《观光纪游》中的言论不以为然。在 1890 年刊印的《增订法国志略》中，王韬公开地表明了对冈千仞言论的批判立场。不清楚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的言论是否与《观光纪游》有关，也不清楚冈千仞读《重订法国志略》的感想。但冈千仞对王韬感情上的距离更趋增大则是无疑的。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1897 年王韬去世。1912 年冈千仞在“今日欧学盛行，岂有顾余文者乎”的暗淡心情下亲自编定《藏名山文初编》。³⁶ 王韬在《增订法国志略》中对他的批评，在文集中毫无反响，而他在 1880 年游北海道归来后满怀激情写给王韬的信函，仍如实地以《与王紫诠书》为题收入该书第四卷。在同一卷记录幕末他与松本奎堂、松林伯鸿生死相交的《答松林伯鸿书》后，还收录了王韬长达二百余字、以“得知已于日东”形容自己与冈千仞相交之深的评语。想必冈千仞欲在文集中真实地保留下他对中国、对王韬曾有过的一段情感，因为这也许是他一生对汉文学刻骨铭心追求中的重要一环。

冈千仞在与王韬交往的最初阶段，虽含有在近代方向发展的动因，但是并未发展下去，两人的关系仅局限在对于传统文化情趣的共鸣，而且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冈千仞及日本其他汉学者在追逐正在日本逝去的美好事物——汉文化——的心境下与中国文人交往，在中国文人那样的精神境界和中日两国那样的关系背景下，他们的交往活动以及他们正在从事的汉文学事业，就只能成为汉文化在日本逝去中的一曲哀婉的挽歌。

参考文献

- [1] 冈千仞 〈禺于日录〉绪言[A]. 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C]. 草私史亭, 明治十四年版
- [2] 冈千仞 (订正) 尊攘纪事补遗[M] (卷三之二). 东京凤文馆, 明治十七年版。
- [3] 冈千仞 尊攘纪事[M] (卷一). 东京龙云堂, 明治十五年版。
- [4] 明治名家文评[A], 明治人物逸话辞典[C] (上). 东京堂, 昭和四十年版, 202 页。
- [5] 冈千仞. 尊攘纪事[M] (卷二之三).
- [6] 赵烈文日记[A].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C]. 中华书局, 1962. 166.
- [7] 近代江苏藏书研究[M].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75.
- [8] 中村正直. 记安井仲平托著书事[A]. 敬宇文集[C]. 吉川弘文馆, 明治三十六年版 (卷十六页二十七—二十八).
- [9] 中国教会新报[J]. 台北: 华文书局影印本, 1877—1878, 1887—1889.
- [10] 陈桂士. 〈普法战纪〉序[A]. 普法战纪[C]. 癸酉秋七月中华印务总局本.
- [11] 汪向荣. 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23.
- [12] 万国公报 (1880-4-17). 台北: 华文书局影印本, 7187.
- [13] 竹添、李鸿章应接报告书[A]. 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 井上毅关系文书[C] (《梧阴文库》) A—588.
- [14] (日)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M]. 三联书店, 2000. 5.
- [15] 六合丛谈[N] (1857-8).
- [16] (美) 费正清、赖肖尔. 中国: 传统与变革[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399.
- [17] 中村正直. 〈冲绳志〉前序. [N]. 申报. 1879-10-1
- [18] 万国公报[N]. 7410、7351、6976、7628.
- [19] 《〈涉史续笔〉叙》, 《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
- [20] 法兰西志[A]. 附言[C].
- [21] (英)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64.
- [22] (美) 史华兹. 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41.
- [23] 文明论概略[M]. 33.

- [2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 中华书局, 1980. 1540—1541.
- [25] 王紫詮之来游[A]. 匏庵遗稿[C]. 392.
- [26] 清实录[M] (八). 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 147—152.
- [27] (美) 刘广京. 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 435.
- [28] 黄遵宪遗墨[J]. 近代中国(第九辑). 153—154.
- [2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 (第一卷). 160、161
- [30] 扶桑游记[M]. 392.
- [31] 王韬. 答〈强弱论〉[A]. 弢园文录外编[C]. 中华书局, 1959.
- [32] 邮便报知新闻[N] (1879-6-26).
- [33] 观光纪游[M]. 45—46.
- [34] 清季名流学士遗墨[J]. 近代中国第十一辑, 289.
- [35] 鹿门葬送录[M].
- [36] 冈濯. 〈藏名山房文初集〉跋[A]. 藏名山房文初集[C].

注释

1. 新井白石《白石先生余稿》; (日) 大庭修《江戸时代日中秘话》,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第 107—108、113 页;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第 292—300 页。
2. 清代康熙帝借用西方传教士的力量实现了全国的地理测绘, 并送往西方制铜版印刷, 但雍正朝对“中国舆图”流往日本的问题则十分敏感。(见《清朝柔远记》,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75 页) 日本方面同样如此。
3. 《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64 页;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91—92、111、116—117 页。1859 年 3 月, 在沪活动的文人管小异致函冯桂芬, 传递日本方面的信息: “日本国亦能制造火轮船, 游驶西洋, 侦探各国虚实, 舟人都通西洋各国语言文字, 其用心可谓周密, 将来能与西人抗者, 日本其一也”。(见《王韬日记》第 91 页) 在华西方人关注日本的更早事例为 1850 年威妥玛译《海国图志》有关日本章节, 刊于《中国丛报》。见王家俭《魏源年谱》, 第 125—126 页, 转自《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第三册,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第 98 页。
4. 赵烈文系康熙朝名臣户部尚书赵申乔六世孙, 其祖举人, 父进士, 本人交游广泛。咸丰年间赵氏藏书情况, 参见《近代江苏藏书研究》, 第 70—76 页。1860 年上海洋行赴长崎贸易渐多, 但管制尚严, 赵氏在王韬处所见日本书籍, 应系去长崎传教的传教士携来。
5. 1862 年“千岁丸”访沪留下资料缺乏向中国人赠书的记载, 但随船武士名仓予何人曾称: “弟所贻有吾邦兵书一部, 请他日以其书示诸君, 愿赐高批贤评”。名仓又谓该书“系百五六十多年前吾邦人所着”。《沪城笔话》(写本), 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藏: “特别买上文库”, 编号 3800。
6. (日) 佐藤三郎《明治时代前期中国人所作有关日本研究之书》, 《近代日中交涉史之研究》, 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版。应宝时在同治年间热衷于赞助刻书, 如刻《龙川文集》、《啸古堂文集》等, 其幕中罗织有齐玉璠、蒋敦复等江南著名文人。由索书事情可见当时日本书籍仍不易获得。另外, 《国史略》和《日本外史》虽同系 1820 年代后期日本史学名著, 但后者比前者更为著名, 从中也可可见沪上知识界对日本书籍所见甚少。
7. 安井息轩, 名衡, 字仲平, 号息轩。日本幕府儒员, 与盐谷宕荫、木下犀潭并称幕末儒学大家。安井在明治时期, 政府“征不起, 家居教授, 以斯道自任”; 撰《辨妄》、《与某生论共和政事书》、《睡余漫笔》等, 抨击西学、西教, 力主孝悌忠信为政教大本, 为明治时代坚守儒学传统的代表人物。出其门下的明治政治家、名将谷干城, 1880 年主持创立以复兴儒学为宗旨的“斯文会”, 任副会长, 会长为有栖川亲王。
8. 1867 年 6 月俞樾赴宁, “戴子高从俞荫甫借得日本人安井衡所著《管子纂诂》示我, 刊本精美, 其解释处颇有发前人所未发”。(见《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 2001 年版, 第 92、101、118 页。) 戴子高即戴望(1837—1867), 浙江德清人。诸生, 通音韵、训诂, 治经学, 有《戴氏论语注》、《管子校正》等著, 1867 年入江宁刻书局任分校。
9. 荻生俎徕(1666—1728), 也称物茂卿, 其弟荻生北溪系直接服务于幕府将军的“寄合儒者”。俎徕《论语徵》、《大学解》、《中庸解》等著在 1809 年传入中国, 《论语徵》在嘉道年间已为中国学者所重视。(见严绍璎《日本中国学史》,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34—136 页) 1866 年戴望在“杭州书肆得”《论语徵》一书, 示于俞樾。俞氏评价该书“议论通达, 多可采者”。见《春在堂随笔》卷一, 页十。
10. 1877 年竹添进鸿将安井著《论语集说》寄赠俞樾, 见《春在堂尺牍》, 卷一页二十四; 卷五页七一—八。
11. 名仓信敦即名仓予何人, 日本滨松藩藩士, 幕府官学昌平黉出身。为幕末至明治初日本外交开创时期的活跃人物, 除多次来华外, 1863 年作为幕府使节随员赴法, 途经香港曾拜会王韬。(《王韬日记》第 214 页; 《扶桑游记》第 474 页) 1870 年 7 月明治政府首次派出修约使团来华, 名仓在随员之列, 并以其在上海官方的关系为打开交涉途径发挥重大作用。(见《桐城吴先生日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90、392 页) 此后名仓甚潦倒, 刘铭传在台湾办矿务, 名仓 1888 年曾应刘邀请率日本井工赴台。见《大日本人名辞书》, 东京讲谈社昭和四十九年版, 第 1941 页。
12. 俞樾 2、3 月间当在上海道台衙门遇名仓。3 月 20 日张文虎、戴望于南京“道见日本数人游街市中, 从而聚观者甚众”; 戴望偕李善兰当日赴名仓下榻客栈拜访。戴望于名仓一行有“中亦有通书画吟咏者”的好

感，并以此函告俞樾，于是有前引俞樾《与戴子高》函。见《张文虎日记》第81页。

13.《息轩遗稿》卷三，明治十一年版。应宝时在上海道任上经办日本幕府对华交涉事情，（见《赵烈文日记》第428页）1869年迁任江苏按察使后作为李鸿章副手参与1871年中日修约谈判的筹议及交涉。1871年安井取著作数种交日本第二次赴中国修约谈判使节，“嘱曰：见彼绩学任劬勤者赠之为幸”，后呈赠李鸿章、应宝时。（见若山甲藏《安井息轩先生》，藏六书房大正二年版，第248—249页）应宝时又为其《左传辑释》作序，安井引应宝时“以为海外金兰”。安井去世后，其门人增田贡等于1879年转辗托人将碑文寄应宝时，请书“墓碣篆额”。见增田贡《清使笔语》卷四（写本）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藏：“特别买上文库”，编号3795。

14.应该正视直至同治初年中国士人在著述上对日本事情仍然淡漠。大约在1848年之后，就不断有日本漂流民被英国或美国船带至上海，其中有被洋行长期留用作翻译或其他工作者，如怡和洋行的音吉等人。（见（日）冲田一《日本和上海》，上海大陆新报社昭和十八年版，第55—72页）王韬著《瀛壖杂志》收录明清两代、尤其19世纪中后期上海风土人情，但未见有关日本漂流民的记载。至1860年代初幕府及各藩派赴或途经上海者甚多，但中国方面的记录几近空白。最为显著的是1862年“千岁丸”访沪，成员多达51名的日本使节团在上海近一月，广泛接触官方及民间人士。此时因战乱缘故，各地士绅云集沪上，其中有冯桂芬、华翼纶等敏感于近代事务者，但少有关于这一近代中日关系重大事件的文字记载。如华翼纶曾亲自与使节团人员交往，但所著《荔雨轩诗集》、《荔雨轩文集》却未留下这方面的任何痕迹。笔者所见中国人记录“千岁丸”访华事件仅有如下两则：一为廖村遁客《虎窟纪略》记其弟汪植三来信述与使节团人员唱和诗事；一则为“千岁丸”使节团成员大阪伊藤和（即伊藤军八）1879年辞公职后来华游历，遇沪上士人顾洪，顾氏有《遥赠伊藤和先生录尘诸大词宗正和并序》之作，述其师顾翥、其叔顾麟1862年与使节团人员交往事。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1880年11月5日《申报》；《文久二年上海日记》东洋文库昭和二十一年版，第68、70页。

15.《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14页。另外还有1860年代初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制洋器议》的言论等。1860年代中后期南方士绅已有中国在应对西方挑战的措置及处境均不如日本的感想。见《赵烈文日记》，第428页；《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16.同治九年春《复方子可》，《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1页。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国内刊印的本国及世界地图，其精细程度晚清中国也不能企及。方楷，字子可，江苏阳湖人；其父方骏谟，字元微，精于地理，曾绘制长江图。同治初年方氏父子甚受曾国藩看重，先后在安庆内军械所、江宁刻书局任事，曾氏两江总督府收藏有“昔年方子可所造地球”。1880年代先后受两广总督张树声、张之洞聘在粤达十年，曾“纂广东海道图说数万言”。《张文虎日记》第55、140页；张维熊纂《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九页一。

17.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A]（1884—10）.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C]，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同治年中国官方人员赴日另外的例子是1872年上海会审公廨委员陈福勋赴日接回“马利古士号”船中国苦力。

18.南方政界和知识界对日本情况的了解多是表面而且片断，尤其对其国内政治状况几无所知。如1868年春赵烈文与龚孝拱谈中英换约事，联想到日英关系状况时，仍以1863年“萨英战争”、1864年“下关战争”为背景，想当然地认为1865年出任驻日公使的“巴夏里现在日本打仗”，表现出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及其对外关系真实状况的无知。（见《赵烈文日记》，第428页；（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2—115页）日本来华使团多以书籍为礼品赠中国政府及私人。如1873年日本外相副岛种臣来华，以德川光圀编纂于17世纪的《大日本史》赠京师同文馆十部，赠中方陪同官员孙士达和同文馆总教习丁魁良各一部。（见（日）佐藤三郎《明治时代前期中国人所作有关日本研究之书》）1874年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赠文祥《管子纂诂》、《续古史略》各一部。（见《使清日记》（写本）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藏：“市村文库”216—IW—10）至明治初年日本不同时期的史学名著均已传入中国。

19.中村正直文发表后，安井息轩作《与某生论共和政事书》，宣布与中村绝交。明治初年日本汉学界发生这一事件，所涉人物对上海文化界并非完全陌生，所涉主题则与中国现实息息相关，虽有西方传教士从中推介，然中国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该事件反应的记录。

20.栗本锄云《王紫诠之来游》，《匏庵遗稿》明治三十八年版，第392页。（据日文译出）栗本锄云（1822—1897年），名瑞见，号匏庵、锄云，出生于幕府侍医之家，8岁从安积艮斋课句读《孝经》，1843年入昌平黉，1864年后参与幕政，官至外国奉行，主持横须贺造船所建设方案、法式陆军练兵，以及法语学校设立等，1867年被派赴法国，直至幕政结束被明治政府招回。1872年栗本受聘报知新闻社执掌笔政，1878年当选东京学士会院会员，为明治时期与福地源一郎、成岛柳北等齐名的著名报人。1878年栗本作为报知新闻社代表发起邀请王韬访日。

21.王韬《扶桑游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16页。（以下简作《扶桑游记》）1879年5月26日《邮便报知新闻》。

22.虽然1854年日美开港谈判判，日本尚少具备英语翻译能力的人才，但此后幕府属下的其作等兰学世家及时由兰学向英学转移，幕府办“蕃书调所”培养通英语的洋学人才，幕府和各藩陆续派出留学生，至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及民间在英语翻译方面的力量并不比中国（包括香港在内）逊色。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出于军政界了解中国国情的需要，曾组织政府属下的译员在四十余日内将近二百页篇幅关于第二次鸦片战

- 争的英文著作《北支那战争记》译出，于当年11月刊印。参见《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5—88页；其作麟祥《〈北支那战争记〉附言》，《北支那战争记》，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藏：“市村文库”216—IW—12。
- 23.《观光纪游》，（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二辑第613种，第178页。中村正直通英语，但其藏书中国出版的汉文基督教书籍数量可观。
- 24.1879年9月9日《邮便报知新闻》。该文无署名，文后录有王韬点评。日本汉学家为王韬《扶桑游记》作序也均在如此意义上及对《普法战纪》的观感。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汉学家对《法兰西志》所作点评，也表现出与此文相同的文学及史学的意趣。见《法兰西志》，明治十一年露月楼本，卷六页十六、二十一。
- 25.当时明治政府属下的修史局仍然是汉学家的一统天下。
- 26.此即冈千仞履历书所谓“明治三年征召为大学助教”的经历。
- 27.《联邦志略》系在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华人合作的中文译着。
- 28.《美利坚志》，博闻社明治十年版。“例言”从其内容可知作于书成之际，然所署时间“明治四年辛未（1871年）十二月”，当是冈氏欲说明该书编撰开始之时间。冈千仞着史一贯有强烈的挑战洋学者的意识，参见《法兰西志》卷六页二十二，眉批。
- 29.《普法战纪》系张宗良、陈霭廷等精通西文的报人与王韬合作的成果。本文如此对比《普法战纪》与《美利坚志》，无意指后者是借鉴前者的经验。
- 30.李善兰《〈美利坚志〉序》后附冈千仞的跋语。（见《美利坚志》）近代早期中日文化交流双方都有超越两国利害冲突的倾向。
- 31.1873年7月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小栗栖香顶来华考察中国佛教，旅居北京一年，有《留燕日记》传世。1880年3月艾约瑟著文报道日本佛教界派遣“僧人出洋寻察耶稣教、喇嘛教并各类教门事”，编就《显承述略》一书，并专门介绍“东京修史局正总裁”重野安绎为该书所作序文。见《万国公报》第7100页。
- 32.《美利坚志》“例言”，见《美利坚志》。
- 33.《敬字文集》卷十四页四一五。该篇题材及思想倾向都表明它作于幕末时期，属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日本社会警惕西力东侵背景下的时论作品。同类作品还有《论练兵》：“夫国之不可无兵，犹虎豹之于爪牙，蜂蛮之于毒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力东侵的威胁下，幕府儒员中村氏与“倒幕”强藩长洲藩的阳明学者吉田松荫不但在丰臣秀吉的东亚扩张战争问题上，而且在“志士”情怀上有共识。中村幕末作品《反苏子〈留侯论〉》，誉张良“搏浪之击”“褫祖龙之魄，激义士之魂，可谓之忠义之勇而已；智勇二字，余犹恨其未足尽子房也”。中村对苏轼《留侯论》的批评，包含有对宋以来中国士人丧失将理想付诸于行动的果敢决绝勇毅精神的认识。盐谷宕阴赞赏该文“利如慧剑”，“非空论也”。（见《敬字文集》卷二页十六、页一一二）另外，早在面临近代挑战之前，日本儒者赖山阳（1780—1832）1818年作《佛郎王歌》，大概盘溪（1801—1878）1841年作《佛兰西王词》，皆咏叹拿破仑。尽管他们对拿破仑的穷兵黩武各有不同程度的非议，但都表现了以世界为视界，对曾建有伟业的失败者不予轻视的心态。见《山阳诗钞》，天保四年版，卷三页十一—十一；《昨梦诗历·献芹微衷》，大正十四年版，“天保十二年”条目下。
- 34.《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7—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日本研究者认为：“武士道最初是由武士的实践需要发展而来的，并通过儒教的道德思想，作为武士阶级的道德，而且作为国民道德的基础加以普及”。见（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
- 35.《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第120页。具体文字可参见中村正直作于1871年的《忠益说》。（见《敬字文集》卷二页十七—十八）幕府时代的“长子继承”、职业世袭等社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使士人及普通民众对于职业有尽“天职”的意识。
- 36.赖肖尔认为：“在日本，对领主效忠比起来要更处于整个体系的中心位置，超过对家族的效忠，——因此，超家族的集团很早就在日本形成，其重要性超过了家族本身。这使日本在近代比较容易地转变为对国家和对其他非亲属集团的效忠。”（见（美）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另外，日本社会普遍接受“养子继承”的传统，表明中日两国对儒学伦理价值的社会实践有许多根本区别。
- 37.《日本人》，第135—136页。福泽谕吉撰着《文明论概略》也关注于对国民个人自主自立意识的启蒙。
- 38.中村正直将1867年版英国斯迈尔斯《自助论》译为日文，1871年以《西国立志编》为名出版；将1870年版英国穆勒《论自由》译为日文，1872年以《自由之理》为名出版。虽为日译，但两书序均系汉文，尤其前者除总序外，各章也都有篇幅可观的汉文序文。中村独立译介西学，辅以汉文序言介入个人的观点立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学传统对日本汉学者的深刻影响。
- 39.中村对汉学的造诣及钟情给中国士人深刻印象。王韬称他“世仕幕府，至君独以儒学显，文章倜傥称一时，幕府擢君官”。明治年后从旅日华人王漆园学汉语，黎庶昌称他“能用汉音读中国之书”，“当明治维新之际，汉籍输出，贱同草芥”，中村竭力收藏，“积多至三万卷，虽中土人士，罕有比”。见《扶桑游记》第426页；（日）竹林贯一《汉学学者传记集成》，关书院昭和三年版，第1236—1246页；黎庶昌《〈敬字诗集〉序》，《敬字诗集》，大正十五年版。
- 40.1879年成立以福泽谕吉为会长，包括洋、汉、国学者的东京学士会院，中村入选会员。
- 41.《自叙千字文》，《敬字诗集》卷四页五六—五九；《〈冲绳志〉前序》，1879年10月1日《申报》。
- 42.《扶桑游记》第426页；黎庶昌《〈敬字诗集〉序》，《敬字诗集》；傅云龙《〈敬字文集〉序》。傅序载于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第288页。（以下简作《游历日本图经余记》）
- 43.参见《西国立志编第一编序》、《自由之理序》等文。见《敬字文集》卷五页六一—七、十一—十二。
- 44.《题〈藏名山房文钞〉》，《拙尊园丛稿》卷六页二十八；《〈敬字诗集〉序》，《敬字诗集》。两文均系黎

庶昌 1889 年作。前者为冈千仞文稿序，黎氏自称在日期间，“读其全稿者，有三氏焉，曰中村敬宇、藤野海南、冈天爵”，遂以对中村、藤野的推崇反衬冈千仞为文的不足（《敬宇诗集》以序的形式收该篇）；后者为中村诗稿序，黎氏文虽然空洞，但在儒学理想人格的意义上肯定了中村及其所从事融会东西方学术的工作，这大约成为该篇不能被收入黎氏《拙尊园丛稿》的理由。至于冈千仞，尽管他所主张的社会进化论不能被中国知识界接纳，但《题〈藏名山房文钞〉》因包含对其文风乃至思想倾向的指正，被收入《拙尊园丛稿》即不存在障碍。

45. 1873 年中村作《〈美利坚志〉序》已全面展现其非战主张。《拟泰西人上书》表示他接受西方宗教影响，但《四圣像赞》所谓：“井上园了君使画工图四圣像，四圣者孔、释二氏，及琐克刺（苏格拉底）、韩图（康德）也。孔、释之教，拯溺救焚，向微二圣，人禽曷分。欧洲哲学，尤推琐、韩。知大宗师，固道德根。弱肉强食，今尚未已，卓美之世，何时可待。炳烛余光，嗟我老矣，继往开来，望在俊士。”（见《敬宇文集》卷十五页九—十）该文更多反映出中村的东方宗教立场。中村藏书有大量佛教经典，表明明治时期其非战主张主要受东方文化的影响。1870—1880 年代向中国社会推介中村最力者的林乐知在 1890 年代编辑各国皈依基督教的代表人物时选择新岛襄，而不以中村作为日本的代表人物。（见拙著《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沈毓桂个案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3—234 页）这表明中村在后期宗教立场渐与基督教疏离。中村去世采取日本社会传统上普遍接受的佛教葬仪，冈本监辅为其作小传时特别强调此点。见《日本维新人物志》，东京金港堂书房明治三十六年版，卷三。

46. 1868 年明治政府颁布《五道告示牌》，声明“继续严禁基督教”，直至 1873 年才承认基督教信仰自由。中村为推动政府废除禁教令而作《拟泰西人上书》，并因此遭遇师友非议。安井息轩作《与某生论共和政事书》与之辩论，并谓：“足下尝游于我门，与闻忠孝仁义之说，非纯从事洋学者之比也，是以敢一言之，苟也与彼徒附和，以唱共和之说，其罪甚于不知而为之者，请自此绝，勿再踵我门”。安井从来以“卫道”为己任，早在 1795 年仙台藩洋学者大槻盘水（1757—1827）（名玄泽）在公历元旦日聚友庆贺，作“新元会宴图”并文以示纪念，为此安井作《拟乞禁夷服疏》予以抨击：“近闻洋学之徒，有以冬至后二日为元日，置酒招友朋者，或着洋夷纪年于伞烛，公然揭之道路，是显奉彼之正朔也；故夷言不禁，必穿夷服，夷服不禁，又奉夷正，如此而不已，必将有服夷教以为至当者，势之所至，渐不可长也”。（见《息轩遗稿》卷二页十一—十四，卷一页三十九—四十一；《汉学学者传记集成》第 989—997 页）中村正是在如此艰难境遇中完成《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等译作的。

47. 《加藤翁年谱序》，《敬宇文集》卷十五页十。明治时期中村的特立独行得到从政府到学术界宽和的对待，他同时活动在汉、洋学界两大群体中，在汉、洋两个学术领域都有所成就。这与同时期中国孤独的先行者郭嵩焘的遭遇恰成鲜明对照。

48. 《祭丁丑亡者文》，《敬宇文集》卷十三页十。在《近世伟人传序》中，中村不但将吉田松荫等维新志士誉为“使一世进乎文明”的“伟人之翹楚”，而且认为统一德国的俾斯麦、中国的中兴名臣李鸿章“皆一代伟人”。（见《敬宇文集》卷十四页二十四—二十五）王韬说西乡隆盛“为近代伟人，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甚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此与专为叛逆者，原自殊科；余来东国，闻之日人所言如此”。（见 1879 年 7 月 2 日《邮便报知新闻》）王韬所谓“闻之日人所言如此”，已包含明显保留态度；至于《扶桑游记》又改作：“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梟雄”。（见《扶桑游记》第 443 页）近代中国士人的“强弱论”，无论以“用强”或“用弱”为立场，都回避对个人在道义准则下的追究。对西方关系持“用弱”立场的有代表性文字，有第二次鸦片战争金安清《洋务宜遵祖训安内攘外自有成效说》，该稿以《密陈夷务疏》为名由殷兆镛奏清廷。

49. 明治元年中村正直作《咏项羽》：“掉头不敢渡乌江，末路奇踪谁得双；好是始终成项羽，何须隐忍效刘邦”。（见《敬宇诗集》卷二页二二）反映了作者追随失政后的德川庆喜赴静冈的心情。前幕府官员在明治时期都以民间人士继续在社会发生影响，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栗本锄云等，都成为日本近代文化界的领袖人物。

50. 中村《跋〈中学习字本第二帖〉》：“余读吉田松荫先生此文，感其忧国之诚动天地，悲愤之气薄云霄。宜乎身死而名立，以为今日中兴之倡首也。呜呼，狡焉思肆者，何国蔑有；弱肉强食，今犹昔也。邦人其可晏然高卧乎？如此文者，宜家置一本，口诵手写，庶可以兴起志气，发愤勤业，虑危而图存矣。”（见《敬宇文集》卷十三页八）吉田和西乡均为不惜将争端付诸血与火解决的志士品格的代表人物。由该文可见，明治时期中村的非战言论主要是针对日本社会及明治政府在东北亚对朝鲜、琉球及中国的扩张倾向，他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并不乐观，抱有清醒的认识。

51. 在华西方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较早关注到“教民”、“养民”问题，其出发点仍在于强调政府的责任，而缺乏对个人责任、亦即对个人自强自立的特殊关注。

52. 两诗均系取英国诗意译作，与《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为同期作品。诗作寄托了中村从事译书及创办“同人社”，以教育国人为己任的志向。

53. 傅云龙《〈敬宇文集〉序》谓中村之文“不逐流又不泥古”，“以六经为注脚，以五大洲时务为经纬，文人之文岂其匹欤？”（见《游历日本图经余纪》第 289 页）他编《游历日本图经》，所收江户和明治时期文人作品，录有中村作品二篇：《重建狭山茶场碑记》、《纪念碑》（为镇压西乡隆盛西南叛乱战争中政府军阵亡者作）。

54. 传教士韦廉臣 1876 年春第二次游日，有感于“与前次之日本大相迥异，诸政焕然一新”，著游记《日本载笔》在《万国公报》发表。在烟台条约背景下，韦廉臣嘱林乐知再刊中村文，于是《万国公报》刊《拟泰西人上书》，并配发编者按和韦廉臣长达八百多字的推荐文。见《万国公报》第 3386—3389 页。

55. 在《环游地球略述》“日本自尊自贵”篇中，林乐知介绍西方人对日本文化的看法，关于神道教认为：“当平时时各有所尊之神，胜者不但威力能胜，并其所尊之神而亦胜也；败者非但为胜者所制，并轻其所尊之神，而尊胜者所尊之神矣”。这是在1879年中日琉球争端的情况下，林乐知关于崇尚“强胜劣败”的日本文化的感想。见《万国公报》第6863页。
56. 《申报》同日刊出重野安绎《〈冲绳志〉后序》，与中村的观点立场截然相对。
57. 《笔话》，1884年7月11日《邮便报知新闻》。驻日公使馆随员陈桀1888年作《〈中村敬宇文〉序》有“余与敬宇，虽相距万余里，然久耳其名，及至东京，甫一再见”之说。见《敬宇文》，明治十三年版。
58. 1874—1876年受聘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人叶松石与中村交往颇密；1889年有署名“南皮受业张文成”者作《〈敬宇先生文〉跋》，谓“文成东来，从先生游，年余矣”。见《爱敬余唱》，明治九年版；《敬宇文》。
59. 中村自传体长诗《自叙千字文》作于1883年，后为答谢俞樾赠书以该诗赠阅。（《答井上陈政书》，《敬宇文集》，卷十五页一）1889年俞樾亦有自传体长诗《曲园自述诗》。在俞樾著作中不乏关于与日本士人交往及其著述的评述，其中以竹添进鸿为最，但没有留有与中村交往的痕迹。
60. 《寄谢隐庄先生书》、《〈栈云峡雨日记〉序》，《敬宇文集》卷一页十三，卷六页十八—十九。谢隐庄名鹏飞，籍常州。1863年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为淮军筹饷，谢隐庄以“司马”身份见郭氏；1876年传教士经谢氏手向郭嵩焘赠书，该年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向郭嵩焘“询及谢隐庄之为人，疑赫总税司计谋皆所赞画”，可见谢氏系受聘赫德在海关司理文书者。1866年随赫德游历欧洲的旗人斌椿，也是这样有政府背景而为“赫德延请办理文案”者。谢氏《止至善说》、《复蒋犀林司马书》、《崔祝三学说序》、《格言四则》等载于1875年5—8月号的《中西闻见录》。中村为上述各篇作读后感，均收在《敬宇文集》卷一。另外，谢氏还将《焚余草》交中村评阅。谢氏于1860—1870年代在中国政界、知识界的活动情况，见《郭嵩焘日记》（二），第102页，（三），第6、9、12、23、35、40页；《王韬致谢绥之函》，《近代史资料》（总6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61. 中村《西国立志编总序》即有“敬天爱人”之说，1875年春作《爱敬歌》，他与大槻盘溪唱和诗集也在1875年以《爱敬余唱》为刊印。
62. 《清议报》，影印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97—1800，1863—1869页。梁启超此期文字与中村正直译介的《自由之理》的关系，参见（日）土屋英雄《梁启超的“西洋”摄取与权利——自由论》，《梁启超 明治日本 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63. 当时孙宝瑄长期从日人学习日语，1903年3月8、14日甚至有从佐伯氏“授读《哲学论纲》”的记录。是年孙氏阅读所涉，除严复《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外，有日译德国《国家学》、加藤和（弘）之《物竞论》、卢梭《民约论》等，其兴趣显然在政治学方面。见《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309、311、358、364页。
64. 《自助论》，（上海）通社发行，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首版，三十年三月再版。
65. 幕末中村理论上主张“用强”对抗外力挑战，《偶读南宋史有感》一诗有“噫嘻大厦覆，岂能一木堪”句，（见《敬宇诗集》卷一页三十九）这与他在实践上主张“开港”的立场是一致的。旅居英国的经验令中村认识到西方在东方的扩张只是通商和传教两方面，属于文明意义上的挑战。《西国立志编总序》谓英国“为民委官者，必学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爱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慎独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长于艰难之人也”，“其俗则崇尚德义，慕仁慈，守法律，好赈济贫病者”，批评魏源《海国图志》关于“英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的说法。明治后中村更多在文明进步的意义看待近代的挑战。
66. 中村作为幕府儒员，宗朱子之学，主“佐幕开港”；冈千仞则宗阳明之学，主“尊皇攘夷”。
67. 《题〈藏名山房文钞〉》，《拙尊园丛稿》，卷六页二十八。
68. 大槻盘溪（1801—1878），幕末著名汉学家。其父大槻盘水为仙台藩兰医，幕末著名兰学家，盘溪之堂兄大槻平泉即前任养贤堂学头。盘溪以长子大槻盘里继父业习兰医，盘溪则习儒，并在1832年“藩侯擢列儒员，以季子别起家，住江户为侍讲”。1868年东北藩诸组成反明治政府的奥羽越列藩同盟，大槻盘溪“司军国文书事，及事败，以此下狱，既而被赦”，1871年复来东京。有汉文著作多种传世，去世多年后，1889年政府大赦令取消其原罪名，1924年获政府授予“赠从五位”殊荣。见《盘溪大槻先生墓表》，《敬宇文集》，卷十页八一—九。
69. 《致石泽二水书》，《藏名山房文初集》，卷四页一一三。幕末政治斗争激化了日本儒学朱子学与阳明学间的论辩。时在熊本藩朱子学者木下犀潭门下学习的井上毅留下大量研习宋史辨析朱熹与陈亮（同甫）是非的笔记手稿，如《灯下录》（1—5）、《朱子中和说始末》、《朱、陈二先生霸问答》等。（见《井上毅关系文书》D—1、D—15、D—21、D—28、D—12、《北京漫录》之13《汉人尊内贱外》等）郭嵩焘对南宋以来中国士人好轻易对外言战之传统的批判，受到井上毅的关注，当与其学问兴趣有关。
70. 《论奥羽处分书（代公议院议员）》，《藏名山房文初集》，卷四。1879年冈千仞忆当年事：“奉将幼主济倾危，大厦真成一木支；奔走干戈骚扰际，维持宗社覆亡时”。《东旋诗记》页五，《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
71. 1884年冈千仞访华与盛宣怀笔谈自称：“弟林下人，久绝念仕途；弟邦十七年大乱，弟籍在奥羽贼藩，与今萨长诸藩翼王朝者相仇，故仕途辘轳，又不欲与一般奔竞辈争尺寸，故谢泛交，卖文为活”。（《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502页）
72. 姚文栋《〈涉史续笔〉叙》，《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复目生书》，《藏名山房文初集》卷四页三一—五。
73. 明治时代日本汉学者之历史观有摇摆于“三代之治”情结之间者。如冈松谷作《〈法兰西志〉序》，声称“谓天下之治终于唐虞三代者，吾斯之未能信也”，但同时“余又有说焉，夫天下之治未必终于唐虞三代

也，然后世享国长久，民俗淳厚，未有驾于唐虞三代而上者”。然冈千仞无“三代之治”情结，《法兰西志》卷一史论谓：“欧洲上古，各部酋长专事杀戮，弱肉强食，视人命如草菅，所谓野蛮是也”；卷二史论谓“法国之有国会，创于法兰哥之时，——至圣路易王归立法之权于国会，统行政之权于君相，——始为君民同治之体，各国模仿，骎骎乎日进文明之域”。《重订法国志略》中，有王韬篡改“异史氏”名下冈千仞言论的个别例子。如卷三史论，冈千仞盛赞路易九世与腓力四世分别创始、发展了“三级会议”民主政制，曰：“盖欧洲各国法律与汉土同名而异其实，汉土法律出于法官所制，故其为法，以张政府威权为主，政府威权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矣”。王韬篡改此说为“盖欧洲各国法律尚有三代之遗风，不务其名而求其实；夫治国大纲不外两端，一尊君以临民，一保民以辅君；君尊民卑则必以张政府威权为主，政府威权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矣”。（《法兰西志》，卷一页十二，卷二页十六，卷三页二十三；《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卷三页二十七）

74. 藤野海南，名正启，号海南，出身世仕松山藩之家，1859年受藩命游学江户昌平黉，后松山藩购轮船，受命学习航海术。明治时期藤野出任明治政府修史馆，为三等编修官。黎庶昌谓：“海南儒者，笃行自修，其文若煦日晴云蔚霏，使人可亲也”。见《题〈藏名山房文钞〉》。

75. 虽有受美国强迫开港的屈辱感，但这并未干扰日本汉学者对西方殖民历史的认同。

76. 出于“华夷之辨”立场，中国士人和日本汉学者均未以正义性诉求于西方在美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藤野视西方殖民前之美洲为“淳朴未散之地”；冈氏称土著民为“土蕃”。李善兰《〈美利坚志〉序》谓：“米利坚州昔者荆榛遍地，野蛮杂处，今者文物声名冠于地球，谁之功也，自科伦布创觅新地，西班牙、英、法诸国之人继之”；1892年为纪念新大陆发现四百周年王韬曾作《哥伦布赞》。（1892年5月1日《申报》）同时期日本西学者则在国权的意义上考察近代西方的殖民问题，认为中国历史上宋元鼎革、明清鼎革，以及“印度被英国所征服，美洲土人被白种人所驱逐，这都是丧失国体最鲜明的例子”。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20页。

77. 《美利坚志》结尾的史论，冈千仞以正义性诉求于美国独立战争，并有圆满的结果：“盖（华盛）顿不忍视其民苦英国暴敛，移书四方，论无受虐之理，义正辞顺，万非齐桓、晋文假名仁义以逞诈术之比也”。华盛顿在中国受到普遍赞扬也有同样的背景。

78. 《〈法国志略〉原序》，《重订法国志略》。王韬于1870年曾据丁日昌寄《地球图说》编成《法国图说》，所谓《〈法国志略〉原序》（署时间1871年）即《〈法国图说〉序》。对法国史的兴趣，导致王韬1873年撰着《普法战纪》。王韬访日后，曾于1880年4月就在中国刊印《法兰西志》等作品事致函冈千仞：“弟拟将米、法两志加入弟之所译，重为刊行，何如？”（见《王韬遗墨》，《近代中国》第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王韬1890年刊印《重订法国志略》，该书直至波拿巴王朝的历史均“取资于日本冈千仞之《法兰西志》”。（《凡例》《重订法国志略》）但不清楚王韬如此作是否得到冈千仞的首肯。

79. 传教士慕维廉称：“作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升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有以知所以盛衰升降者之原于上帝”。传教士阐释的历史与传统的“天命观”多有相通，因此他们的译着叙述史事尽管有进化的线索，但传递进化史观念的意义甚少。《〈大英国志〉序》，《大英国志》1856年“墨海书院刊”本。

80. 《法兰西志》，《附言》。《法兰西志》述制器史事“火器”占重要地位，如卷四《格利西之败》一节借英法百年之战法军惨败克勒西事（1346年），述火器自阿拉伯传入欧洲，英国人“创意制硝药试之，功用如神，是役英王用之实战，奏一大奇功；自是列国争传，制造日精，大小炮盛行于欧土，高城深池，坚甲利兵，无所施其用，兵制为之一变”。见《法兰西志》卷四页二一三。

81. 《法兰西志》作“前加颂的”王朝。

82. 《法兰西志》，卷三页十六一十七。对于十字军东征的评价，王韬与冈千仞没有任何分歧，他在此段中插入如下文字：“数十年间屠戮二百余万，战争方息；欧洲人胆略雄壮，心志坚定，虽遇危难而不挠，历艰险而益奋，悬军万里，视死如归，宜其横行于五大洲而莫敢撓其锋也。”（《重订法国志略》卷三页二十一）王韬对十字军的赞叹用语与日本汉学家在《法兰西志》一书所作眉批无任何区别。另《法兰西志》述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占领耶路撒冷，为保有耶城占领权，“自是列国出征，兵结不解者，一百五十年；往古勿尼西、希腊、埃及等商旅，航地中海，往来贩卖，民赖其利；及罗马衰乱，各国割据，贸易衰废，民日失业；及十字军兴，四方商贾至亚西西部，卖兵装军器，得利巨万，地中海一变为舳舻辐凑之地”。（《法兰西志》，卷三页六一七）

83. 《法兰西志》，卷三页十七，眉批。书中各卷前均注明“重野安绎、藤野正启评阅”，眉批无署名者当属二氏。重野安绎（1827—1910），字士德，号成斋，萨摩藩藩士，23岁入昌平黉，与冈千仞同学，1863年萨英战争后出任萨摩藩对英交涉委员，维新时参与藩政改革，明治时期为政府修史馆一等编修，东京学士会院会员，后为元老院议员。重野1880年参与创办斯文会，并出任斯文黉学监。在治史方面，重野致力吸取欧美修史方法，从考证主义出发批判封建史学。

84. 路易九世执政近40年（1236—1270年），组织并亲率1248—1254年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和1270年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第七次东征路易九世在埃及大败并被俘，第八次东征出发当年即在突尼斯染疫而亡。这些史事丝毫未影响冈千仞对路易九世的评价。

85. 《法兰西志》，卷三页二十二—二十三。《法兰西志》述十字军东征史事也不乏负面评价的内容，如“法国虽出兵于万里，国内争扰无一宁日”。但书中甚少非议发起东征者，如关于发起第三、第四次东征的腓立二世，“是时列国屡起十字军，府库空虚，人心骚然；王独追治其政，考制度抚百姓，国力富强，并弱兼昧，版图愈大”。见卷三页七、九、十三。

86. 《法兰西志》，卷三页六，眉批。

87. 《法兰西志》，卷三页九。
88. 《法兰西志》，卷三页九，眉批。
89. 在社会对个人立场缺乏道义追究的背景下，中国士人注重在人事面前保持社会统一评价的立场。相对于对个人行为道义性的评价，对于事件本身评价的标准和角度更趋多维化，更难求得统一的评价立场。王韬在社会进化论等问题的立场多变和矛盾，多发生在这样的意义上。
90. 法兰西志作“后加颂的”王朝。
91. 《法兰西志》，卷四页二十一—二十二。评者对瓦罗亚王朝战事有如下评说：“欧土以百战鼓舞列国活泼有为之气，日夜磨厉不少钝其锋芒，此所以致今日之富强，又所以致今日之文明。”（见卷四页十六，眉批）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评冈千仞此说为：“此日本儒士一孔之论也。”（《重订法国志略》，卷四页二十五）（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对王韬与冈千仞之对立有十分出色的评论。（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6页）王韬的反应并非因不能容忍儒学非战观遭受非议，他1850年代作《反〈用强说〉》亦有大胆反对儒学非战观的言论，1868年前后作《答〈强弱论〉》则表明在文明扩张意义上认同社会进化论。（参见拙作《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在《重订法国志略》中，王韬同样表现出在“用强”说的层面上与社会进化论的共鸣。王韬对冈千仞言论的反应主要是受中日两国现实冲突的影响，他不但批评冈氏关于丰臣秀吉用兵朝鲜的观点，而且直接提出琉球问题，批评日本儒者“于法之穷兵黷武不以为可戒，而反以为可法，此殆近于浮浪子弟倡为尊攘纵横之说者，而不意出于儒士之口也，吾无取尔也。”（《重订法国志略》，卷四页二十六）面对近代之时势，有用强之心思，然缺乏将用强付诸行动的精神勇气，这是王韬面对社会进化论态度暧昧动摇的症结所在。
92. 《法兰西志》，卷四页二十，眉批。传统“用强”说有“甲冑久藏则朽，戈矛久顿则坏”的经验之谈，喻“强势”只有在不断地应用中才能得以保持（见王韬《反〈用强说〉》）。1877年“日本新报有论者，引孟子之言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诚哉是言也；盖无敌国外患，则上恬下熙，自以为富强可恃，而安而忘危，其衰败之几早伏于其内矣”（见《新报论安不忘危》，1877年8月18日《万国公报》，第3996页。此系《万国公报》在“大日本事”栏下选录日本报刊舆论）。冈千仞之“抗抵力”说的创意性在于，以有近代科学背景的物理知识喻对立的双方在激烈的对抗中相互砥砺而致强者益强的社会进化论观点。
93. 《法兰西志》，卷六页二十一—二十二。
94. 评者对该卷的评说和龟谷省轩《〈法兰西志〉序》，都对冈千仞关于拿破仑的评价有所非议。而王韬则对冈千仞关于拿破仑的史论予以肯定，谓：“冈千仞此论可谓能得其要领矣。”（《重订法国志略》卷六页三十。
95. 福泽谕吉对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欧洲宗教战争的评价与冈千仞有较多的相同之处，承认它们在欧洲社会政治文明进步中的价值（参见《文明论概略》第126—129页）。但福泽对社会进化论理性认同的立场和冈千仞绝对化的接受立场有所区别。
96. 《冲绳志前序》，署1877年8月，1879年10月1日《申报》。
97. 《冲绳志后序》，署1877年9月，1879年10月1日《申报》。重野从语言和种族角度的论证琉球归属日本，遭到中国士人的反驳。（见《琉球小志》，该书系姚文栋对日本有关冲绳历史地理书籍及文章的编译）日本舆论在地理角度论证琉球归属日本，则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士人所接受。如谓：“夫日本地处东海，西南之外其属岛接连琉球北部，以形势言不啻其地之余土也，固宜为其屏藩，世作附庸。”（见《书日本新闻纸各论后》，1879年2月11日《申报》）
98. 《〈冲绳志〉序》，《藏名山房初集》卷一页十六—十七。幕末至明治初期俄国步步深入库叶岛、千岛，并有将其势力范围扩及北海道之势。俄国的远东扩张促使日本开拓北海道的同时，强化了向朝鲜扩张的动机。1871年后日俄间就北方领土问题进行交涉，至1874年日本以获得全部千岛群岛的领土权为条件放弃对库叶岛（桦太）的领土要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128、135、155页。
99. 《法兰西志》，卷六页二十二—二十三。维新运动中以吉田松荫为代表的“尊皇攘夷”志士，以丰臣秀吉大陆扩张事业的继承者自居。
100. 《法兰西志》，卷六页二十二—二十三。其实评者亦曾以“查理曼王似我丰太阁”赞赏丰臣氏，（卷一页四，眉批）只是冈千仞在拿破仑、丰臣秀吉间的褒贬引起评者的异议。
101. 1879年12月7日《日本竹添进一上书》，《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页十一—十二。
102. 1879年10月19日《复曾劼刚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页一—二。1872年中日换约日本外相副岛种臣来华，曾就琉球漂流民在台湾遇害事派员赴总理衙门询问中国政府处理立场。清政府对日本此举甚为警惕，但毫无作为。1874年中日台事条约签定，《循环日报》于1874年12月发表《西报论琉球所属》、《续论琉球所属》，（转载于1874年12月26日《万国公报》，第477页）论及西方舆论提出条约暴露琉球归属问题：“顾琉球介于两大之间，此时究属于何国，当议和时未及明言也；中国偿餉于日本——其中十万系抚恤琉球被难之家，其银由日本转界琉球，则琉球之为日本所属不言而喻”，但仅满足于为中国的立场作辩解，毫无以此警示、并进而启蒙国人之近代国权意识。1875年明治政府禁止琉球对中国朝贡和接受册封的惯例，琉球请求清政府出面干预，引发中日间的外交交涉。然1879年间中国士人主张干预琉球事，也只是出于“本朝不失信于琉球”，“（琉球）世守臣节而不能得中国之援，如之何其国也”（见《申报》1879年2月11日）等道德性的考虑。
103. 1879年12月9日《论球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页十。
104. 1878年5月30日《复何子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页五。此前李鸿章曾试图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谈琉球事，然对方避而不谈。李鸿章在琉球事上的立场是其1874年12月10日《筹议海防

折》关于海防、塞防争论立场的延续，代表依据中国现实国力以积极放弃对藩属地宗主权，减轻防卫负担而达到有效自卫的国防策略。所谓：“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千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 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1875年2月19日《复丁雨生中丞》亦谓：“鄙论渐弃新疆——实皆万不得已之谋。”（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八—十九，《朋僚函稿》，卷十五页六）1878年7月郭嵩焘《英国调处喀什噶尔事宜六条折》沿袭李鸿章同样的见解。（见《郭嵩焘日记》（三），第258页；《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3—194页）李鸿章放弃西北，专注海防有防日的针对性，然1875年日俄订立《库叶岛、千岛交换条约》，日本在俄国扩张态势下的地位，使李鸿章比较容易响应日本“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的“兴亚论”主张。李鸿章1876年11月12日的《论日本邦交》即反映了这样的迹象。（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六页三十一—三十二）在四面临敌的局面下，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政策呈复杂多面性，然对日本的警惕和不信任是基本的。王韬等人的主张也有同样的特点。

105. “琉球取贡日本梗阻”，冒险来华吁请清政府干预的琉球官员于1877年春抵达中国，清政府决定坐等首任驻日公使赴日后再着手交涉。1877年底何如璋抵日本，直至1878年春夏之交，中国方面对是否交涉仍举棋不定。1878年7月4日《总理衙门奏日本梗阻琉球入贡现与出使商办情形折》表明直至此时何如璋尚未向日本提出交涉。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0—163页。

106. 1878年5月30日《复何子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页五一—六。

107. 李鸿章《〈栈云峡雨日记〉叙》，《栈云峡雨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九辑第583种。竹添光鸿1876年以政府派员随外交使团来华，独自游历中国西部诸省，着成该书。1877年他再度以民间身份来华主持日本民间对华北的赈济活动，颇得李鸿章好感，两人私人关系由此建立。

108. 《万国公报》第5768页。《万国公报》载该文有1878年11月下旬中日琉球交涉形成僵局的背景。

109. 据（日）西里喜行《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一文辑《循环日报》主要论文目录，1874年—1876年该报刊有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文章，然至1878—1879年之交中日两国在琉球问题上的冲突骤然升级，《循环日报》尚未给予特殊的关注。（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314页）；1878—1879年之交的《申报》也基本是如此情况。

110. 训点《普法战纪》使明治政府修史局编修重野与民间报人栗本相交，此次训点的版本即刊印于1878年供陆军将校以下军官阅读的陆军文库本。见《王紫诠之来游》，《皕庵遗稿》第392页。

111. 《法兰西志》，卷二页十，眉批。

112. 《藏名山房文初集》，卷二页二十一—二十二。日本大警视川路利良赴欧洲的时间见《遍考监狱》，《申报》1879年2月11日。

113. 《普法战纪》贯穿基于循环史观的非战论思想。王韬也认识到战争在西方文明演进中的意义，所谓：

“夫彼既割据日多，则争竞迭出，欲以夸强而侈胜，遂不得不增兵而益防，舟车枪炮之技尽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驾其上”。但他不是以进化的而是循环的立场理解竞争的终极意义，认为“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俱困然后已，盖智巧至是几莫能加，未有物极而不反者也”。王韬从根本上否定竞争于人性的积极意义，无限夸大竞争与道德不相统一的一面，所谓“智巧愈极，机诈愈深，情伪相感，利害相攻，祸患之来，气机已召；——徒讲武备，尚兵力，刻鹗奋厉，以相倾轧而慑制，则必有一蹶者矣；——天道循环断不或爽”；期待“去雕琢而归淳朴，屏诈力而尚德行”理想时代的来临。见《〈普法战纪〉后序》。

114. 《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在《送佐和少警视奉使于欧洲序》中，冈千仞于立场和语言均系《美利坚志》、《法兰西志》等的自然延续。如以“检出”一词说西方人发现殖民地在《美利坚志》中即已出现；冈千仞1879年5月作《〈万国史记〉序》亦有“及阁龙（哥伦布）检出西大陆，始明地球圆转之理”一说。见冈本监辅《万国史记》，明治十二年版。

115. 《万国公报》1881年11月26日、1883年4月21日，第8580、9840—9841页。关于沈毓桂其人其事，见《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沈毓桂个案研究》第一章相关内容。

116. 傅兰雅《佐治白言》，上海富强斋译书局“光绪庚子年八月重校”本，卷上页二十五、十六、九。

117. 1879—1881年王韬与郑观应的关系及《易言》出版后的遭遇，见拙著《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七章有关内容。

118. 《李朝实录》第5271页。壬午事变前《易言》在朝鲜被视为邪说。

119. 《藏名山房文初集》，卷二页二十一—二十二。该文后附张焕纶评语：“惯用悬崖勒马之笔，故恣肆而非奔放”。对黄遵宪的评语，冈千仞常公开对有涉思想观念问题的部分表示不以为然。如黄遵宪对冈千仞作吉田松荫、佐久间象山传的评语。（见《藏名山房文初集》卷五；《（订正）尊攘纪事补遗》卷二。《吉田松荫传》后未收黄氏评语）但面对纯文学意义的批评，冈千仞的态度多是谦和的，见其《〈东旋诗纪〉绪言》：

“沈梅史来访，观此篇，指示疵病，大有所悟；后又请政公度黄君，君为余论学诗之法，颇为详密；二君中土名流，今幸得亲接提撕，真希世之遇也，乃取评语一一附注”。所附评语如实保留批评性文字。见《东旋诗纪》，《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

120. 《日本国志》，卷四页一。另外卷二十一《兵志一》：“外史氏曰：开创多尚武，而守成则尚文；乱世多尚武，而治平则尚文；列国多尚武，而一统则尚文，自昔然矣。然而弛备者必弱，忘战者必危。——况于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耽耽虎视者乎？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盘敦雍

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各国深识之士虑长治久安之局不可终恃，皆谓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中国之论兵-----所谓不得已而用兵也；泰西之论兵谓如人之有手足，无手足不可以为人，所谓兵不可一日不备也。”（见《日本国志》卷二十一页一）梁启超于1901年作《李鸿章评传》，以日本英雄史观遍论中国当代政治家，声称“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其中论曾国藩：“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后梁启超以评价曾国藩之学问、事功及人品请教于黄遵宪，1902年末黄氏致函梁启超，论曾氏之事功：“其功业比汉之皇甫嵩，唐之郭子仪、李光弼为尤甚，然彼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此其所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职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黄氏论曾氏之人品：“论其立品，两虎之先贤牌位中，应增其木主，其它亦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全面呼应了梁启超的见解。（见《李鸿章评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100页；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八辑第671种，第267—268页）黄遵宪思想言论演变进程中，明显有受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思潮，包括日本社会的中国观影响的印记。

121. 郭嵩焘由英国归国途经香港，3月24日日记述头等舱自欧洲登船的乘客在香港均去，“新添五六人，无可与谈；因忆己卯（1856）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初识王韬，“顷阅子潜《瀛壖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同舟之谊，潇潇风雨，恍然于心”。4月17日日记述邀王韬晚餐。（见《郭嵩焘日记》（三）第819、835页）可见王韬于3月23日与郭嵩焘同船离香港，27日抵沪，随即还乡，4月17日前又回到上海。而1879年3月下旬《申报》有关琉球的舆论已趋热烈。

122. 4月8日何如璋关于琉球“废藩置县”的电报抵沪（见《郭嵩焘日记》（三），第828页）；4月10日《申报》载《日本灭琉球》。

123. 为重新启动琉球事交涉，1879年4月初日本驻华公使 户玕来华赴任。（见《公使来华》，《申报》1879年4月5日）日本政府继而派竹添光鸿来华，想借助竹添与李鸿章之私人关系，辟非正式交涉途径，以说服中国放弃对琉球的宗主权

124. 《扶桑游记》第409、412页。5月21日是《扶桑游记》中关于日本汉学家与王韬交流时局聚会的唯一记录，内容包括关于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评价等。

125. 《普法战纪》“光绪丙戌仲春阳湖汪学瀚署检”本，卷二十页四十四—四十五。（在《普法战纪》“癸酉秋七月中华印务总局”本为卷十四）

126. 奕欣等《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5页。

127. 冯桂芬《制洋器议》、《重专对议》，《校邠庐抗议》；张斯桂《〈万国公法〉序》，《万国公法》同治三年版。王韬也基本不出此范围，1871年《〈普法战纪〉前序》有“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普仅等宋卫焉耳，英法俄奥则晋楚齐秦也”的说法。

128. 《普法战纪》，卷二十页四十四。塞嘉溪连岛即库页岛。

128. 王韬于1871—1873年编纂《普法战纪》之际形成中国国势由弱转强之循环转机已经出现的信念，导致1874年他将创办的报纸定名为《循环日报》。

130. 《普法战纪》，卷二十页四十三。

131. “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以幸无事；四者之中弱一个焉，则必不能成鼎足之势。-----俄以改黑海之盟告英，-----仅以一纸书抵十万甲兵，英国拱手听命，莫梗一词”。见《〈普法战纪〉前序》。

132. 《〈普法战纪〉前序》。王韬如此说明“天心”最初发生之机：“普法启衅之始，不自其先，不自其后，而适在去岁之秋，盖天不欲法以私忿毒天下也”，指天意不欲法国借“天津教案”用兵中国。

133. 《扶桑游记》第415页。该诗作于5月23日，刊于5月26日的《邮便报知新闻》。《观光纪游》1884年12月6日记：“今也时势一变，虽以百战所并新疆犹且腴削，何有于藩属诸地，前年紫谿东游说此事叹息。”

134. 王韬和中国士人对日本“兴亚论”的响应将另文讨论。《记香港总督燕巢斯氏东游》及王韬为广部精《翻刻〈中西关系论〉序》所作评语都有涉及“兴亚论”。见1879年7月10日、8月20日《邮便报知新闻》。

135. 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及王韬等评语刊于6月14日《邮便报知新闻》。

136. 《扶桑游记》第453页。王韬此说与黄遵宪对《送佐和少警视奉使于欧洲序》的评语基本相同。

137. 冈本监辅（1839—1904年），号韦庵。“年十岁服农耕，旁读书”，“后数年，厌耕脱走京阪，访诸名家”。明治初年“上筹边说于朝再三”，任官北海道四年。（《〈日本维新人物志〉自序》）1875年冈本得军部资助遍游中国，所着《万国史记》含中国近代历史部分，1879年在日本刊印，次年上海即有翻刻。（见《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第322页；1881年7月10日《申报》）1884年张树声编《敦怀堂洋务丛钞》收有冈本监辅《万国总说》三卷。1880年创办斯文会冈本与重野、中村等参与制定会则，并出任斯文教员。冈本后期编着作品《孝经颂义》、《铁鞭》、《大日本中兴先觉志》、《西学探源》于1901年在上海刊印；且该年冈本来华游历，曾抵武昌“欲一见张总督（张之洞），以质回澜之策；会总督有疾，不得见”。（见河濑长定《〈西学探源〉序》，《西学探源》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七年版）张之洞《劝学篇》、清廷新政以及俄国拒不从东北撤兵问题，都是促使冈本求见张之洞的原因。冈本《〈孝经颂义〉序》曰：“余尝憾汉唐以降诸儒说经，徒惊文字章句之末，不能有大益乎人心世道，而后世泰西心物原理之说，日竟高妙新奇，动辄与孔孟背驰也；不敢自量，以韵语敷演经义，自孝经

始，及论语、中庸、易、系辞、传等；命之曰颂义，欲与后进共放眼大处，着实进修”。所叙著述动机恰与王韬《扶桑游记》的评述相符。冈本着《日本维新人物志》关于中村正直、安井息轩的评述也表现了他忠于儒学的立场。作为兴亚论者，竹添光鸿也类似冈本监辅，1884年俞樾复函竹添的言论可见这样的相似性。参见《与日本竹添进一》，《春在堂尺牍》，卷六页五。

138. 早在5月21日聚会中，王韬对近日洋务西学局面已有过“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的不佳感想。（见《扶桑游记》第413页）王韬访日初期这样的言论可能并非少见，1879年6月27日《邮便报知新闻》以“清国之一贵客观我之国情，几至于亡国；而欧美人皆谓我国渐步入进步”为题材作社论：《论外国人之论我国情》。港英总督在日本就中国、日本的国际贸易问题发表演说，1879年6月21、23日《邮便报知新闻》连载社论《香港上海之新闻论说》，从重视日中两国相互间巨大贸易利益为引，评6月6日、7日《申报》转载《循环日报》的《论高丽近事》、《论东瀛近闻》二文，谓：“何《循环日报》记者视势如此之狭隘，论事如此之偏见；我政府唯增进彼我之间贸易之利益耳；《循环日报》记者以战国策士之口气评论我国，由此而发生许多谬误。”（据日文译出）此例从侧面反映了王韬在日期间与日本汉学者基于国家立场的冲突。

139. 《扶桑游记》仅记“余作四题”，未及篇名。（见《扶桑游记》第438页）此处文章排序系《邮便报知新闻》刊载顺序。《弢园文录外编》卷七、卷十收有《智说》、《〈地球图说〉跋》、《华夷辨》、《记香港总督燕巢斯氏东游》系王韬旅日期间的作品。

140. 1879年6月23日《邮便报知新闻》。《梧荫同门诸家文集》（写本，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藏：“特别买上文库”，编号1206）收井上毅（号梧荫）《孔明自比管乐论》、《程门诸子淫佛论》、《〈栈云峡雨纪行〉跋》（各篇均附何如璋、黄遵宪评语），以及中西牛郎《送友人某游支那序》、国友重章《对策一道》（关于中俄伊犁交涉事）等汉文著作。作者均出自幕末熊本藩木下犀潭门下，但《华夷辨》以署名“清王弢园”收录为该文集的结尾篇。井上毅作为明治政府重要的政治家，参与对华外交政策制定及交涉，他于1877年作《〈栈云峡雨日记〉跋》谓：“环球而居焉，其民分为黄、白、黑三大种。今也，白人之势若潮之方进，若风之方发，而黄、黑二种式微矣。盖黄种之居于东洋者数邦，有并土地人民移之于他人手者，有奴役者，有割地者，有予利柄于人，而已自腹削者，所被虽有深浅，所及虽有早晚，总之不免立于一大厄运中，而仅自救之不暇也。”表明其“兴亚论”立场。井上毅1880年在北京参与琉球事谈判，以《北京漫录》为题记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诸多问题资料，其中2、“清国兵力”、5、“各省督抚，附李鸿章之权力”两专题下都关注到镇压太平军后清政府满汉权力转移问题。（见《井上毅关系文书》D-12）金子弥平游历中国后于1883年着《支那总说》一书，其中卷一“支那”、卷四“满汉之异”等都接触中国满汉矛盾问题。这些都可作为理解《梧荫同门诸家文集》录入王韬《华夷辨》动机的背景资料。

141. 明清鼎革在锁国状态的日本萌生“华夷变态”的中国观。在长崎贸易中收集的中国情报，经幕府儒学者编辑整理定名为《华夷变态》。1790年代幕府以揭示清代中国“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辨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为动机，通过对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的调查研究，编纂《清俗纪闻》，全书十三卷，分礼、乐、射、御、书、数六帙，全面记录清代中国南北各地，从官方到民间的社会文化礼俗的变化，并有大量的图标。“华夷变态”论成为日本大陆扩张主张正当性依据之一，幕末到明治时代的“兴亚论”者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关注满汉矛盾在中国近代社会演变中的意义。如吉田松荫《与赤川淡水书》（见国民丛书社编辑《吉田松荫遗墨》，商务印书馆，卷中页二十四）。以《华夷辨》为课题表明日本汉学家有意触及对中国士人十分敏感的问题。

142. 1879年6月24日《邮便报知新闻》。《〈地球图〉跋》关于世界趋向一统的信念与王韬1860年代后期作品《答〈强弱论〉》有延续关系，但思想的倾向性发生了变化。“天命观”构成《答〈强弱论〉》的消极一面，但顺应时代变化的变法主张决定了文章的积极倾向，所谓“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而《〈地球图〉跋》完全缺乏如此积极的文字。

143. 1879年6月23日《邮便报知新闻》。近代之初“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魂洋才”舆论的出现，令无论中国或是日本对于人的才智重视趋于增强，而《智说》没有从近代方向着力“智”在发现及改造自然世界中的价值，而是从传统的方向着力“智”在道德意义上的价值。《智说》虽在传统的方向上着力，但其本质却是叛逆传统。因为它是否定传统道德去发掘“智”的价值。

144. 早在“庚申之变”与太平军横扫江南的1860年，王韬即如此表明在危局下的处世立场：“大厦倾，非一木可支；黄河流，非一手可障。文天祥、史可法，其才岂后人，而竟至决裂，亦时之无如何也。”（见《王韬日记》第181页）天命观、循环论恰适应王韬智者的消极的人生态度。

145. 1879年8月27日《王韬致栗本锄云函》谓：“《扶桑游记》须经沈梅史先生改定后，乃为印行，盖临文固不可不慎也。”（见1879年9月8日《邮便报知新闻》）沈梅史即驻日公使馆随员沈文荧。无论是谁的作用导致《扶桑游记》中“清华吟馆”的课题隐而不显，都足以说明这些题材在日中关系意义下的敏感性。《弢园文录外编》在不交待写作背景的情况下收录这些文章，表明这些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是可以被认同的。此后王韬又两次出席“清华吟馆”活动，6月16日“会文五篇”，7月8日“作文三篇”。（见《扶桑游记》第449、467页）7月10日《邮便报知新闻》载王韬《记香港总督燕巢斯氏东游》一文，题下附说明：“清华馆席上文题五篇之一”。

146. 《扶桑游记》第386页。增田贡在中国驻日公使馆言邀王韬访日事：“其人抱才不遇，专用意外国之事，新着传播，其中多述我日本之近状。——故我邦人某等，怜其流落，资而迎之，欲结骚盟”。见《清使笔语》1879年3月29日。

147. 王韬旅居日本达四个月，部分日常开销及其购书款得自他在报知社卖字和出卖《扶桑游记》版权予报

知社，包括报知社属下《邮便报知新闻》刊发王韬旅日期间所有作品。王韬言其赴“报知社”作字：“余馆此两月，每往其社挥毫落纸，如蛇如蚓，不忘记也”。（见《扶桑游记》第408、423、427、428、434、477、499页）关于《扶桑游记》版权事见1880年4月黄遵宪与冈千仞笔谈。“冈：扶桑游上卷刻成，已付沈梅史，寄赠王先生。第二卷重野序之，不日刻成，本稿在栗本锄云所。黄：彼欲索草稿。冈：宜就锄云氏而谋之，仆不关此事。黄：敬谢。今日得王紫诠书，嘱仆见足下，索《扶桑游记》草稿中下卷，云将自刻。今日即托阁下，俟暇询之锄云，如何，即以函告我，庶可转复紫诠”。（见《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321页）可见《扶桑游记》版权属“报知社”，事实上后来王韬未能在香港或上海刊印该书。

148. 迁居“报知社”后王韬多有不满，重野安绎作为邀请王韬访日的发起人之一，接他在其家中居住。见《扶桑游记》第434页。

148. 《王韬遗墨》，《近代中国》第九辑，第134、135页；《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十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王韬在日期间进行商业性的购销图书活动，如他提到欲购增田贡着《清史揽要》百部，“至中国销售”；（见《清使笔语》1879年5月26日）5月30日有“书籍二箱从香港寄至”；（见《扶桑游记》第428页）7月底王韬载来书籍未能如数交换或推销尽，曾向冈千仞求助。后来他交换或购入冈千仞著作“米、法两志共七十四部”。他曾以个人著作十六部计七十八册交换东京书籍馆《大日本史》一部计一百册。日本研究者认为从经济而言，王韬在与书籍馆的交换中得益非浅，冈千仞对此起过作用。见《王韬遗墨》，《近代中国》第九辑，第135—137、139、142页；（日）中田吉信《冈千仞与王韬》，《参考书志研究》第13号，1976年8月。

150. 1879年11月25日王韬致函重野安绎函，函中兴奋地谈到他应丁日昌之召赴潮阳一行，所谓：“忽接惠函，正如一朵绛云从九天飞下，回环雒[]，弥念良朋。自此韬即有潮郡之行，先至揭阳，谒丁大中丞，小住絜园六七日。——一时宿于园中者有三八座，而弟以一山人厕其间，每食必居首位，爱才下士，近所罕闻。中丞明春若出而经略七省，拟使弟参赞帷幄，以收一得之效”。（见1880年1月10日《邮便报知新闻》）重野、栗本、龟谷诸人，无论由于个人出身，还是社会地位，都不会对王韬如此自炫有兴趣。栗本初见王韬曾问：“为官人耶，为逸士耶？”令王韬“愕然几不能答”。（见《扶桑游记》第424页）栗本询问中包含对王韬作为近代报人言论立场的质疑。日本汉学者多看重“出处之大节”，前服务幕府者在明治时期多保持民间身份。友人赞冈千仞闲居林下倨傲之态：“不向王门去曳裾，一尊长此赋闲居。”（见1884年6月9日《邮便报知新闻》）冈千仞处世也恰如此，其著作从来只有学界的序跋，《尊攘纪事》有受岩仓具视召见之殊荣，他也仅在《（订正）尊攘纪事补遗》中说明史料来源时略加提及。因在个人出处态度上与竹添进鸿大相径庭，当1884年李鸿章向其询问对竹添的看法时，冈千仞私下告盛宣怀：“此人迂阔固陋，不知时务为何物，弟不特不知其人，弟之所不屑交。唯以其稍知文字，胜武人伪吏眼无一丁字，蒙登用列臚仕而已”。（见《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514页）显然冈千仞在《扶桑游记》跋中对王韬11月25日函的反应表现了过度宽容的同情性理解。

151. 1880年冈千仞接到王韬寄自香港、收有旅日诗稿的《蕲华馆诗录》，有感而作诗：“南迁海岛感坡仙，高树多风岂偶然；忧国至言论法普，匡时大策动幽燕。谁宣浮说厄同甫，自有权书知老泉；乘兴日边来问俗，风流传播万诗篇”。评者谓该诗：“无不一句切遯叟，为肖像赞可”。《北游诗草》，卷二页五，《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

152. 郑海麟以《王韬遗墨》为题辑录此期间王韬致冈千仞函六件。见《近代中国》第九辑，第137—141页。

153. 《王韬遗墨》，《近代中国》第九辑，第140页。1879年12月5日王韬致函重野安绎：“曾托贵国驻港领事安藤尊兄寄书问讯。自阁下外，冈君千仞鹿门先生、西尾君为忠叔谋先生、寺田君宏望南先生皆有书，想已均入典箴矣”。函末又一向包括上述诸人在内的十位日本友人代致问候。（见1880年1月29日《邮便报知新闻》）1880年1月10日《邮便报知新闻》刊载1879年11月25日王韬致重野安绎函，1880年5月24日刊载1880年4月28日王韬致栗本锄云函。诸人都未作礼节性回函。

154. 时重野安绎以《万国史记》序》征求王韬意见，该文批判中国传统国际观念——夷夏论、宗藩观，并有涉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王韬评论该文：“论高识卓，是宇宙间有数文字，读竟不禁摄具三拜”。“其持论明通透彻处，如我意之所欲”。（见1879年6月14日《邮便报知新闻》）5月21日聚会上重野对王韬说魏源当有这样的背景。重野对魏源的文风深不以为然，见他为竹添进鸿《送人赴佛国博览会序》所作评语：“满腔慨世之气，借题而发，语劲笔锐，时见炼句。近时魏默深、蒋敦复辈，有这样文字，而我盐穀侯亦喜作此语”。（见《独抱楼诗文稿》，吉川弘文馆版，文稿一，页四十三—四十五）重野此说表明蒋敦复《啸古堂文集》颇为日本汉学者熟悉，如井上毅藏书目录中即有该书。“盐穀侯”指盐谷谷阴，其《阿芙蓉汇闻》、《隔靴论》等作品表现的著述趋向足以令中国士人引为同调。如俞樾关于盐谷氏文集《宕阴存稿》有近五百字的读后感，称“其人盖留心经世之学者”。见《春在堂随笔》卷五，页 。

155. 《答松林伯鸿书》后附王韬评语，《藏名山房初集》，卷四页五一九。

156. 《扶桑游记》第503页。龟谷省轩（1838—？）对马岛藩士，出身富豪之家，俭朴自持，嗜学如渴，24岁时以病及出仕为由付家业于诸弟。初入东京，师事安井息轩，安井誉其为后进之领袖。明治时期历任大学教官、太政官少史等职，1873年辞官，创办“光风社”，以刊刻、著书为业。龟谷为学，初事经义，后刻意诗文，晚嗜庄、易及释典。（据《汉学学者传记集成》，第1339—1341页）冈千仞誉龟谷“为词坛巨匠”。见《东旋诗纪》绪言》，《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

157. 据日文译出，《明治人物逸话辞典》（上），第202页。斋藤竹堂（1815—1852），名馨，字子德，号竹堂，1839—1844年游学昌平黉，后归藩出任藩校学督，着《鸦片始末》，有《竹堂文钞》传世。日本汉学界以同出自仙台藩的近代文章名家斋藤竹堂、大槻盘溪作比反衬冈氏文章个性，其中隐含对冈氏评价的保

留，令冈氏的友人和门生不平。参见堤正胜《〈涉史偶笔〉后序》，《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斋藤一马《呈鹿门先生》，《鹿门先生概历》（写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藏：“特别买上文库”，编号3621。

158.《冈千仞履历》云：“明治三年受聘为大学助教，继历任明治政府修史局协修，东京府书籍馆馆长，明治十一年病免，后专事著述”。（见《鹿门葬送录》）（写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藏：“特别买上文库”，编号3624）事实上关于东京书籍馆馆长职位，冈千仞于1880年“书籍馆改属文部省，乃移病辞职”。见《北游诗草》卷一“小引”，《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

159.中村鼎五《〈北游诗草〉叙》，《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中村鼎五与冈千仞同时从修史局离职，另外随“千岁丸”访华的大阪士人伊藤和亦是在1879年从修史馆掌记职上辞职。见三岛毅《雪香伊藤君墓碣铭》，《中洲文稿》，第四集，二松学社大正六年版，卷二。

160.《自序》，《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此后冈千仞仍常有命运不平的感慨，如以缅怀死于维新的友人松本、松林二氏而借题发挥，曰：“当时所交之士，士权、伯鸿以下，或死于刺客，或死兵戈；而戊辰之事，投风云乘际会，列名爵班抚仕者，不在于彼而在于此，何天之薄于为始者，而厚于为终者也”。见《〈订正〉尊攘纪事补遗》卷三之二。

161.《扶桑游记》第412页。因此王韬有冈氏“辞官，惟以文字为消遣”；“近则隐居不仕，泉石优游”之说。

162.1879年12月5日王韬致函重野安绎云：“前托钞冈鹿门、沈梅史两君著述，曾藏事否？弟意欲刻之弢园丛书中，藉以问世”。见1880年1月29日《邮便报知新闻》。

163.1880年5月22日《邮便报知新闻》。该文署时间1880年3月20日。

164.《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322页。冈千仞故世后，《藏名山房文初集》于1920年刊行，部分文章后有王韬之评语，当有所谓“文五十篇”中者；但收有王韬评语者不多，如《送佐和少警视奉使于欧洲序》即无王韬评语；显然冈千仞对评语有所删选。该书收冈氏1879年以后作品的王韬评语系1884年所作。

165.1880年5月22日《邮便报知新闻》刊发王韬关于冈千仞文稿评述所加编者按。据日文译出。

166.1879年北京刊刻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翌年春王韬将其收入弢园丛书刊行；王韬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同年刊刻郑观应《易言》。黄遵宪对冈千仞说王韬刻书之动机为：“紫詮穷老不得志，故煮字疗饥，耕砚自活；如仆诗彼尚不惮刻而卖之，况君文乎？”见《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322页。

167.冈千仞游北海道，1880年8月8日起程，年内返回。见《北游诗草》卷一“小引”，《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观粟子窠道记》，《藏名山房文初集》卷三页十三。

168.《〈尊攘纪事〉绪言》。1880年冈千仞眼病甚重，北海道之行原拟作游记，然因“非病眼所能胜”而作罢。见《〈北游诗草〉绪言》，《藏名山房杂着第一集》。

169.冈千仞曾谓：“余曩刻正篇，岩仓右大臣以其叙幕府奉还大政未悉，召余亲说当时事”，并具体建议该书应补订的内容。（见《〈订正〉尊攘纪事补遗》卷四之三）《尊攘纪事》及补遗两书对于冈千仞在经济上也必是获益颇丰，他游历中华的资金一部分当来源于此。

170.冈千仞原计划周游各地后再赴苏州在俞樾门下问学。另见“余见荫甫先生，请反棹日，小留门下受教，先生忻然不敢拒，惜匆卒归棹不达志也”。《观光纪游》第114页。

171.冈濯《〈藏名山房文初集〉跋》，《藏名山房文初集》。1887年冈千仞为1884年游华诗集作序曰：“顾余虽老，志力未衰，若能刻苦于此，积岁月之功，则古能作者，未为难及也”。（见《〈观光游草〉引》，《观光游草》藏名山房藏版）1884年冈千仞访华，“赏《法兰西志》、《米利坚志》、《尊攘纪事》各五十部，《纪事补遗》、《藏名山房杂着》各一百部以充赠遗”。（《观光纪游》1885年1月29日）加上1879年王韬携“米、法两志共七十四部”回国；冈千仞著作在中国知识界的流传是较为可观的。

172.关于冈千仞1884年中国之行的活动将另文讨论。

173.1884年6月11日，初到上海的冈千仞由长住沪上的日人导游鸦片馆，谓吸食者“昏昏酣睡，奄然如死者”。次日在上海文人招待宴会上，冈千仞见王韬吸食鸦片，记有如下观感：“两客连床卧吃。烟禁屢下，而官人富家皆以烟为豪具。一般风习，恬不为怪，无复如之何者，紫詮以一方名流犹为之，噫。”（见冈千仞《支那漫游日记》，1884年7月1日《邮便报知新闻》。但该段在《观光纪游》中被删去）冈千仞认为“紫詮不屑绳墨局束，以古旷达士自处”，并认同李鸿章对王韬“狂士也，名士也”之评价。（见《观光纪游》第113页）虽然冈千仞交友之道亦有宽容随和的一面，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譬犹阴阳水火，反其用而资其功”，但他在“论经史大义，出处之大节”这些带根本性意义的为人处世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十分传统的，（见《送木原节夫归土浦序》，《藏名山房文初集》卷二页十二—十三）因此不能接受王韬等中国士人在1884年时局环境下的表现。由此，王韬以其文学才情及传奇经历营造出来的豪杰之士的光环，在冈千仞心目中完全破灭。冈千仞处世“不能随俗俯仰”和他渴望用世及由此而来的不平之感，与王韬的狂傲及其上书求知于当道的行为，都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的。

174.以此为契机冈千仞进一步论王韬：“余视紫翁溺毒烟，辄称病苦，以为非复前快人。何意腹中有如斯议论也。唯翁涉彼大体，未究彼学术，故间有论未透者。如论我邦，为徒学欧米皮毛，则是也。我邦免至今日，无他，以学得彼皮毛也。若夫神髓，岂一朝所学得乎。”《观光纪游》中冈千仞仍视王韬为知己，有所谓：“余蹭蹬半生，晚得紫詮、经甫（张焕纶）二人，为海外知己，可以少自慰矣。”因此冈氏在《观光纪游》中对王韬的批评是善意的。《观光纪游》第128、138页。

175.竹添进鸿作为外交官在中国和朝鲜推行强硬的东亚扩张外交政策，因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引咎隐退，但俞樾、张之洞仍然同他保持良好的文事联系。（见《复俞曲园太史书》、《与张香涛官保书》、《与张香涛相

国书》，《独抱楼诗文稿》，文稿二，页三十四—四十一）另《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中黄氏与日本汉学者等人员的笔谈。

176. 《弢园尺牍续钞》光绪己丑活字版，卷六页七—八。该函王韬自称“今年已六十矣”，因此作于1887年。傅云龙1887年11月30日记：“冈千仞弟子馆森鸿，以其师所着《观光纪游》一书见，求改其文数首”。（《游历日本图经余记》，第210页）傅云龙所见似当系刊印本。

Oka Senjin and Wang Tao: On Intellectu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1860-1870

Yi Hui-li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al Research & Histor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imited its main interests on topic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ailed to develop incentives for broader conversation on modern thoughts. This was because, as the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Oka Senjin and Wang Tao revealed, there was a distance of spiritual concer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hile Japanese Sinologists were pursuing for the over passed Han culture with nostalgia,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reality.

Key Words: Sinologist; Oka Senjin; Wang Tao;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lligentsia; Social Darwinism

收稿日期: 2003-08

作者简介: 易惠莉（1953—），女（汉族），四川乐山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